

# 磐石文史资料

第七辑

政协吉林省磐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02.23

# 磐石文史资料

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吉林省磐石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顾问：** 阚景儒

**主审：** 马百令  
郝士家

**编辑：** 亓淑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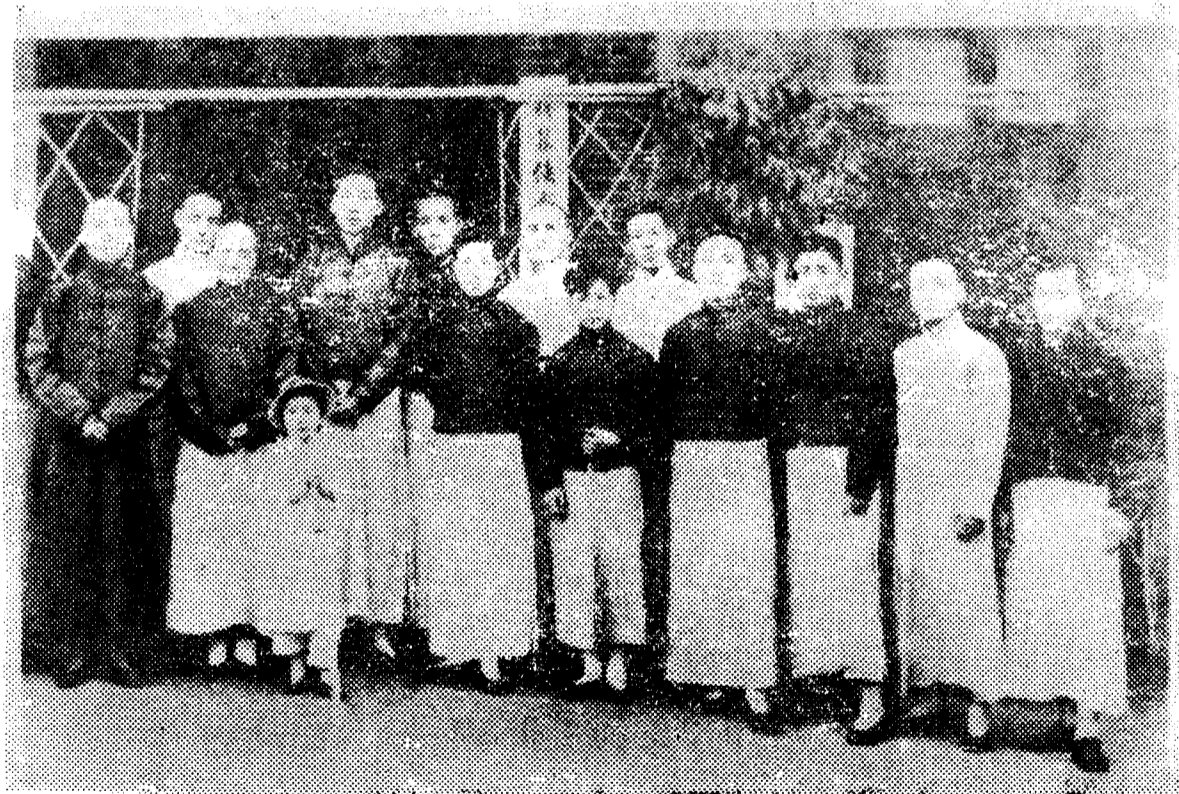
**校勘：** 冉景贤

# 目 录

- 我的父亲韩慕侠……………韩少侠 (1)
- 忆五三年大水与复兴村救灾……………孔宪禄 (60)
- 五十年代区政府的“五·十”工作制……………宋景瑞 (68)
- 对1953年推广肇源丰产经验的回顾……………孔宪禄 (70)
- 解放前磐石的典当业……………耿万林整理 (74)
- 解放前磐石工业……………宋景瑞整理 (77)
- 伪满统治时期的磐石金融业……………耿万林整理 (81)
- 建国前磐石税务……………夏德修记 (84)
- 磐石儒界名流申尔庸……………申国荣口述  
张振国整理 (87)
- 境外兴学的磐石名儒于振民、杨士贞……………于耀洲回忆  
邓小溪整理 (93)
- 入朝三百六十日  
——磐石县抗美援朝民工担架队参战回忆录  
……………韩枫、姜涛回忆 高庆山整理 (97)
- 一宗投毒谋叛事件的追忆……………宋景文 (106)

# 韩慕侠在北京万国赛武大会

## 击败俄国康泰尔所荣获的金牌



1920年秋，韩慕侠（前排右数第七人）与周恩来（前排右数第六人）等在武术馆门前合影留念



壮年时代的韩慕侠



1934年，十二岁的韩少侠和父亲韩慕侠在天津留影



一九八四年秋，韩少侠在驻军某部为官兵做报告

# 我的父亲韩慕侠

韩少侠

按：公元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在北京万国赛武大会期间，天津武师韩慕侠一掌击败号称“震环球”的俄国大力士康泰尔，夺得十一枚金牌，名闻遐尔，大长中华民族的志气，当时即有书报转载。日本深谙武道的松田隆智先生亦在其所著的《图说中国武术史》中向日本各界人士作了翔实介绍（日本新人物往来社出版）。八十年代初，在我国掀起的又一次“武术热”的高潮中，全国各地报刊、杂志又纷纷登载了当年韩慕侠打败康泰尔，为国争光的事迹。影视界以韩慕侠为原型人物，摄制了影片《武林志》、电视片《十一枚金牌》，再现了中国拳师打败洋人的壮举。

幸甚至哉，韩慕侠之子韩少侠（韩琦）久居磐石，虽届耄耋然精神矍铄，文思敏捷。为了存史惠人，向世人全面介绍韩慕侠少年立志，学武传艺，雪耻中华，尚武救国的经历，振奋民族精神，故请韩老先生撰写了此文，以飨读者。

先父韩慕侠，原名韩金镛，一八七七年生于天津静海县卫南洼大泊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祖父韩长恩，曾祖父韩良模。我家虽不是诗书门弟，但却有着忠厚家风。静海县是

个武术之乡，大人小孩都喜欢舞枪弄棒。父亲从小长得身高力大，自幼打下了良好的武术功底。同村的孩子们天天和他在一起翻跟头，比拳脚，都佩服他的力气大，功夫好，敢下手。因此，父亲那时便成了村里的孩子头。

父亲自小就崇敬古代的英雄豪杰，经常在灯前，树下坐在大人旁边听村里老人们说书讲古。《三国》、《水浒》《岳飞传》中的历史名将、英雄人物，都成了他崇拜的偶像。因此，父亲自幼就在心灵深处打下了“喜爱忠臣良将，憎恨乱臣贼子”的烙印，养成了不畏强暴，敢作敢为，不平则鸣的顽强性格。这对他的人品、性格及以后从事的武术事业，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从少年时起就立志要做一名侠肝义胆，扶危济困的神洲大侠。

## 一、少年时期的韩慕侠

我们韩家到我父亲这一代，已是四世单传了。尽管家贫，祖父还是希望父亲日后能有出息，决心节衣缩食送孩子念书。于是，父亲上了村中私塾。在塾中父亲学习用功，尊师爱友，深受好评。在同学中有个财主的儿子叫赵德辉，品行不好，学习更差，经常受到先生的责罚。赵德辉怀恨在心，一天夜里他偷偷地把茅坑前的一棵小树锯得似断非断，但外表却一点也看不出来。先生年岁大，上茅坑时都是手拉坑边这棵小树才能慢慢地站起身来。第二天早上，当先生上完了茅厕用手扯住小树要站起来时，小树啪的一声断了，先生人仰马翻，一下子掉到了茅坑里。当时，大家都以为是小树自己断了，可父亲觉得不对劲，拿起断树仔细察看，发现



断口大部份平平整整，象是有人事先锯断的。他马上想到了赵德辉。这时赵德辉正躲在一边暗笑。于是，父亲把赵德辉拉到老先生和同学面前理论，在事实面前赵德辉不得不低下了头。父亲和几个同学拉着赵德辉回家找他家长，赵的父母理亏，只得带着孩子和礼物向老先生赔礼道歉。由此，同学间流传了一句顺口溜“赵德辉，创树根”。

我有两个姑姑。大姑嫁给邻村姓车的人家了。她的丈夫和公公都是海员，婆婆是后娘。姑姑的丈夫以前常受他后娘的气，我姑姑在他家也是出力不讨好，婆媳间关系一直很差。姑姑婚后不几年就有了两个孩子。这一年，她丈夫和公公在一次海难中再也没有回来。过了不久，她的婆婆就和村子里的一个汉子勾搭上了，这个狠心的婆婆嫌我大姑姑碍眼，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一天深夜拿把剪刀把大姑姑的头发剪下扔掉，天亮时就到村里四处散布流言，说我大姑姑把头发送给了相好的。软弱的大姑姑受不了这个打击，撇下孩子寻了短见。我父亲他们听到后，坚信大姑姑不会干出这种事情，但老实胆小的爷爷感到毫无办法，只好忍气吞声地认命了！而我父亲坚决不干。当时只有十一、二岁的父亲领着十几个要好的小伙伴，到车家找到大姑姑的婆婆辩理，指出她是在贼喊捉贼，逼他说出实情，最后又逼着她和那个汉子为大姑姑披麻戴孝，举着幡，打着锣，敲着鼓围着村子走三圈，以这种特有的方式为大姑姑伸了冤，雪了恨。大姑姑遗下的两个孩子一直由爷爷和父亲收养，后来父亲还认了大姑姑的大儿子车振武为自己的义子。

过去有这样一句话，叫“穷文富武”。意思是只有富裕人家才能请得起名师，练得起武。象我们这样贫穷的家庭岂

能做到？只可在家乡舞弄点花拳绣腿而已。但是，生活中发生的一件偶然事件，却把父亲推上了从名师习武之路。

我家祖辈世代务农，都是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艰苦生活。为了生计，祖父携幼小的父亲，于农闲时节打柴、割苇，用小船（冬天用爬犁），通过天津南墙子河运往天津卫卖。有一天父亲和爷爷从船上卸下芦苇，拴了两付担子挑到天津东北城角柴市出卖。半天过后，遇到一个叫赵秃子的地痞硬要用极低的价钱强行买走。爷爷不答应被他挥拳打伤。怒不可遏的父亲和他拼命，一阵拳脚便把这个地痞打得连滚带爬，抱头鼠窜。围观群众出于好心说这赵秃子是个欺行霸市，无恶不作的地头蛇，劝我父亲快走，免遭赵秃子报复。于是父亲扔掉苇子，扶着爷爷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未走多远，一位慈善的长者追了上来，他早已把刚才赵秃子强行买苇双方撕打的情景看得清清楚楚。当他知道父亲他们是从几十里外的静海县来津卖苇时，便同情地告诉父亲以后有苇不要再到柴市上去卖，可以送到龙亭街三义庙，并说一个铜子也不少付。爷爷和父亲真是喜出望外，隔了几天，父亲和爷爷送苇子到三义庙，才知道这是赫赫有名的天津八大家之一海张五的宅院。那时，豪绅巨贾都雇请镖师护院，这位长者就是海张五家的管家兼保镖的周镖师。通过几次接触，周镖师看我父亲少年英俊，爷俩又忠厚老实，便好言向海张五推荐，把爷爷和父亲留下当了长工。

周镖师武功出众，行侠仗义，在津沽小有名气，而且善武能文，琴棋书画无所不好。海张五对周镖师很是高看一眼，待为上宾，连家属也对他以老师相称。父亲进了海张五家以后，海张五便派父亲专做周镖师的侍从。父亲服侍周镖

师细心周到，他要画画，父亲赶紧磨墨摊纸；他练完武，父亲马上端茶递水，侍候得周镖师心满意足。每当周镖师练武之时，父亲也在一旁认真学练。周镖师看我父亲聪颖过人，又有迷踪拳的功底，就非常喜欢，有时也教他几手拳脚，向他传授技艺。从此父亲开始涉入人生的一大转折，正式踏入武林。

“天津卫三种宝，鼓楼、炮台、铃当阁”。提起炮台来，天津还流传着一个“海张五修炮台———小事一端”的歌后语。这海张五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原本是一个发了横财的大盐商，本名叫张锦文。清咸丰八年，英法联军入侵，炮击天津大沽炮台。炮台失陷后，侵略军沿海河入侵天津，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天津条约》以换取洋鬼子退出天津。爱国将领一致要求要在短时间内修复大沽炮台。清政府派僧格林沁到天津会同大盐商海张五张锦文共办防务。海张五利用存盐、盐坨席包以及白灰等物，命士兵沿白河一带构筑炮台，边堆砌边浇水，因时值寒冬，只花三万两白银，没用多久炮台就修好了。这就是海张五修炮台的一段因由。咸丰九年，英法联军二十艘战舰又入侵大沽炮台，由于炮台已经加固，中国官兵英勇抵抗，把英法联军打得落花流水，击沉击伤敌舰十一艘，打死打伤侵略军四百余名，取得了大沽口保卫战的胜利。为此，清廷念海张五修炮台有功，加封起用海张五为天津盐务总管。就这样海张五很快地飞黄腾达起来，挤进了天津八大家之列，因而更加遭到其他盐商、盐霸的仇视。他们表面奉承吹捧，暗地里却勾心斗角，切齿痛恨。盐田本是盐民的命根子，也是盐商、盐霸你争我夺的重点。有个姓李绰号“浪里蛟”的盐霸出身的盐商，以前同海张五为

争十亩盐田发生过多次的冲突。有一天，“浪里蛟”煞费苦心地在家里摆下酒席宴请海张五。海张五接到请柬后，害怕“酒无好酒，宴无好宴”，便与周镖师商量对策。周镖师说，“宴是一定赴的，不去就会落得被人耻笑”。海张五胆小如鼠，要周镖师亲自多带些人护送，周镖师认为人家是宴请，大队人马前去不合情理，于是便叫刚来不久当小长工的父亲随之前去。海张五望着只有十二、三岁的父亲，心想这个黄毛小子成吗？周镖师叫海张五只管放心前去，他又在父亲耳边吩咐了几句。父亲随在海张五的轿后来到了李家。

“浪里蛟”见年近九旬的海张五身边只有一个小侍从，也未带任何器械，很以为怪，又不好直问。双方坐到宴席桌前，互相吹捧之后，频频举杯劝酒。酒过三巡，海张五便有醉意。“浪里蛟”突然提出那十亩盐田应属于他，要海张五返还。海张五一听重又提起十亩盐田之事，顿时酒醒，双方各持己见，舌箭唇枪，互不相让。“浪里蛟”见软的不行，便来硬的，高叫道：“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可知道，这可是在我家！”话音刚落，客厅门砰地打开，闯进两个手持钢刀的彪形大汉，步步向前逼来。海张五登时吓得魂不附体、满头冷汗。正在海张五束手无策之际，只见父亲“嗖”地一声，从袖里抽出一件闪亮发光的東西，一个箭步跨到“浪里蛟”的身后，不等他反应过来，一件硬邦邦的东西顶住了他的后肋。父亲瞪眼向那两个大汉喝道：“站住！再敢往前一步，我便一‘剑’结果你家主人的狗命！”那两个壮汉顿时傻了眼，进不得，退不是。“浪里蛟”惊惶地对两大汉喝道：“你俩混帐东西，谁叫你们进来的，还不快滚！”两个大汉只得乖乖退出。父亲仍用“剑”狠狠顶住“浪里蛟”说

道：“盐滩归属，自有公理，不要欺人太甚，快送我东家回去！”这出乎意料的举动仅仅发生在瞬息之间，“浪里蛟”已被吓破了胆，连连点头称是。吓蒙了的海张五还以为是一场恶梦，刚醒过来，便顺水推舟告辞了。父亲抵着“浪里蛟”一直把海张五送至大门口。海张五上了轿子，两腿还在打颤，走出约十余里路，他才定下神来，从轿中探出头来把父亲叫到跟前问：“小家伙，来时我怎么没见你拿宝剑？”

“东家，你看！”父亲嗖地从袖口抽出那把“剑”来，海张五一看，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哪里是宝剑，分明是周镖师的那个形状似剑，无尖无刃、放着金光的铜镇纸（写字压纸用的）。

“鸿门宴”过后，海张五对小小年纪的父亲另眼看待，成倍地增加了工钱，后来还让父亲读书，并将爷爷韩长恩由杂工提为张府内的小管事，爷爷一家也搬到天津城内居住。海张五见父亲艺高胆大脑子灵，料想将来定可成为武林高手，如把他哄住了，自己的儿孙将来何愁没名镖师保护，于是他把他叫到跟前笑嘻嘻地说：“老爷我向来不亏待人才，今送你一样极珍贵的东西”边说边把墙上的大刀摘下来，很庄重地双手递给父亲，并告诉父亲：“这是僧格林沁亲王使用的一口宝刀，锋利得很，可以削铁如泥。是老爷我同僧王在一起修筑大沽炮台，抵御英法联军有功，僧王奖励给我的。现转送给你，望你日后武技大进”。父亲接过刀来细看，宝刀长有三尺，鲨鱼皮刀鞘，呈深紫黑色，上面缀有精致的彩色梅花数朵，将刀拉出鞘，真是寒光逼人，父亲大喜。从此“僧王刀”就一直伴随着父亲。

威服“浪里蛟”之后，周镖师见父亲勇敢机智，聪颖过

人，越发喜欢。于是，举行了拜师仪式，收父亲为正式门徒。几年时间，便将技艺尽授于父亲。随后，海张五家日渐衰败，周镖师要另谋出路，便将父亲介绍给他的好友，名震京津一带的武术名家张占魁先生。

张占魁又名兆东。是八卦掌宗师董海川的八大弟子之一。董海川宗师的弟子不下三千，而他最喜欢的就是这八大弟子。张占魁是宗师八大弟子中最小的，而武功又属他最好。他的八卦掌疾如闪电，快似流星，大家管他叫“闪电手”。父亲师从张占魁后，犹如鱼儿得水，夜以继日地勤学苦练，不到两年，功夫大进，在众多师兄弟中，没人能比得过他，谁同他较量，他总是每战必胜。张占魁也是最喜欢他。由于父亲争强好胜，天不怕、地不怕，加之长得身材挺拔，仪表堂堂，大家送给他个绰号叫“玉面虎”。

父亲随张占魁学习八卦掌的同时，又随李存义武师学练形意拳。李存义是形意拳大师刘奇兰和郭云深的得意弟子。他的形意功夫闻名海内，以“单刀李”名遐北国。李存义和张占魁是生死之交，情同手足，不分你我。两人的弟子如出一师，形意，八卦形成一门。父亲随李存义武师学形意拳后，分外着迷，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李存义武师也分外喜爱父亲，悉心传授。

父亲和张占魁、李存义两位武师的师徒之情极为深厚。父亲不但学到了这两位武师的卓绝武功，也学到了他们的高尚品德。李存义武师性情豪爽，义气如天、助人为乐，笃信友谊的美德；张占魁武师的争强好胜，不畏强手、疾恶如仇、宁折不弯的秉性，都深深地影响着父亲。

## 二、青年时期的韩慕侠

张占魁宗师受聘于“直隶捕盗营务处”。父亲在随张、李二师学习武艺的同时，身带一把“僧王刀”，协助张占魁师傅屡破奇案。湖广总督张之洞给皇上进贡的国宝被盗一案，就是一例。案情是：湖北省大冶县在开铁矿时，发现了一块“温凉玉”，一尺见方，冬暖夏凉，夜有奇光，可谓罕见之珍物。张之洞为了讨好皇上，亲自进京献宝。不料在黄河渡口上船时，被贼人勾结水手以偷梁换柱的手法，把温凉玉换走。张之洞到了天津，将被盗之事说与中堂李鸿章。制台衙门督标中军何五喜奉命聘请张占魁、李存义二位武师协助破案。二师各带一名徒弟——父亲和李存义的弟子尚云祥。四人同到黄河渡口一带查访。追踪到临城县后，一天父亲和尚云祥出城闲逛顺便侦察。走到一处山坳里，尚云祥去一旁小解，父亲正要坐下休息，忽见山头坐有一人，贼头贼脑地不时向四下张望，父亲一瞧，不象是个好人，便走上前去。谁知那人做贼心虚，站起身来向山后跑去。父亲来不及向尚云祥打招呼，径直在这人身后追赶。这时，山坳里又闪出一个人来，手持钢刀，把那人让了过去，拦住父亲劈头就是一刀，父亲闪身躲过，接着又是一刀，父亲缩头藏脑，用左手扣住那人持刀的右手腕向前一领，右手从腋下穿出将那人持刀右手腕紧紧抓住，左脚向前上了一步，同时左手顺势朝那人面上就是一掌，也就是用八卦掌中的兜掌，把那人打倒。这时尚云祥赶到，上前把那人一脚踏住，捆绑起来。父亲从地上拣起钢刀，又向前面跑的那人追去，也是三拳两脚，把那人打翻在地，牢牢擒住。经过审问，此人叫吴小牛，他们是抱

犊崗匪幫的人。匪首叫李小水。還供出了搶劫財物和盜取溫涼玉的罪行。於是張占魁師徒四人根據線索，押着吳小牛到李小水經常行走、出沒的幾處地方去捉拿李小水。最後，終於在東店子馮寡婦家將在此鬼混的李小水擒拿，並將溫涼玉從禹王廟的神像後面起出。師徒四人將李小水、吳小牛等人連同搜得的財物交與當地縣衙。帶着溫涼玉回到天津，向總督衙門中軍何五喜交差。幾天後，李鴻章手諭，給辦案有功人員賞白銀一萬兩。父親建議張占魁將分得的賞銀拿出一部分做授徒習武經費；另一部分在天津東北城角侯家後郭家小樓辦了一個施材局、專為窮苦百姓施放糧米、棉衣、藥材和棺木。從此，張占魁、李存義仗義疏財的名聲傳遍津沽。

民國年間，京津一帶出現一個“飛賊”李三，一身輕功，能高來高去，作案後必在失主牆上畫只燕子，有人叫他“燕子李三”。此人行俠仗義，偷富濟貧，盜得財物悉數用來救濟貧民百姓。天津的達官貴人、土豪劣紳提起李三無不心驚肉跳，恨之入骨。警察當局對擒拿“燕子李三”束手無策，無能為力，不由想起張占魁、韓慕俠師徒，便好言懇請二人出來辦案。一日接到鼓樓北大街一家金店老板報案說：

“燕子李三”留下書柬，命其備下黃金百兩，夜間來取，如無黃金定取人頭。是日夜晚，父親和張占魁師徒二人躲在暗處，果然發現有人翻牆而過，便大喝一聲。李三發現有埋伏，扭頭便走。父親他們緊追不舍，一直追到北大關河沿，雙方動起手來，李三不敵，終於被擒，父親很是佩服李三偷富濟貧，仗義疏財的品格，故擒而又縱，把他放了，並勸其不要再干那“雞鳴狗盜”之事，為人應放大眼光，干些利國



利民的大事。从此他们三人竟成了挚友。“燕子李三”出于义气，决意不在京津一带作案给朋友添乱，离津南下。后据报载，李三在武汉被捕入狱后，结识了共产党人蒋有良（黄埔一期学生，后转入地下），并帮助他越狱逃出虎口。由此看来，李三确也做了有益于人民的事。

八国联军侵华攻占了天津后无恶不作，尤以沙俄军最为凶残。他们抢先占据了具有战略意义的老龙头车站，就是天津头一个引进火车头，被西太后称为“黑煞神”的那个车站。这是通往北京的必由之路，也是天津租界列强通往外界的枢纽。清政府迫于人民压力，也曾派兵前去收复，可是清军刚到车站，一看有两千多洋枪装备的沙俄军，吓得扭头便走。在国难当头、社稷难保之际，清政府不得不利用义和团抵抗侵略军。

天津义和团在“乾”字团大师兄曹福田带领下赶到老龙头车站。义和团弟兄大多是信奉神明的乡民组织起来的。他们自以为练就了一身本领，可以“刀枪不入”。冲锋时，他们口念咒语勇往直前。可沙俄兵洋枪一响，便纷纷中弹倒地，损失惨重，只好暂退下来。

在此危难之时，身为义和团武术教习的李存义武师挺身而出，主动请命攻打老龙头车站。领命后的李存义便和张占魁商量对策，我父亲当时也在场。商量结果一致认为，唯一的办法是以夜间偷袭为妙，采取近战，肉搏方法使洋枪的优势发挥不出来，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当时，父亲二十出头，血气方刚，虽不是义和团员，可是在师父张占魁的支持下也随同师大爷李存义出战了。

天刚黑，李存义便带领着我父亲及经过他训练的一百名

“敢死队”，埋伏在老龙头车站附近。一直等到三更过后，他们出其不意砍倒敌兵岗哨，直奔营房。此时，沙俄兵还正在被窝里做着好梦，毫无准备。李存义奋勇当先。力举着七十二斤重的钢刀，父亲手舞僧王刀紧随其后，二人对准沙俄兵，不由分说，手起刀落，一刀一个，真是“大刀一耍，洋头搬家”。“敢死队”员见了无恶不作的洋鬼子也分外眼红，英勇杀敌，刀光闪闪，血花飞溅。在这场殊死的血战面前，沙俄兵鬼哭狼嚎，乱作一团，而他们的洋枪洋炮却哑巴了。曹福田此时指挥着埋伏在附近的大队义和团蜂拥而上，直杀到天亮，沙俄兵狼狈逃窜。这一仗竟杀死沙俄鬼子五百多人，杀伤者不计其数。老龙头车站终于夺了回来。

正当义和团痛击八国联军之时，西太后被义和团的力量吓坏了，竟与八国侵略军沆瀣一气，下令捕杀义和团。京津一带，白色恐怖，血雨腥风，董海川的八大弟子之一，父亲的大师伯程廷华就是在此时殉难的。

李存义作为著名的天津义和团武术教习，他当然被列为清军和八国联军的搜捕对象，所以大家都力劝李存义躲一躲。经过商量，决定让他装扮成大商贾，父亲扮成随从人员，由父亲拉着黄包车送李存义出天津。在路过一个村庄时，碰到三个洋鬼子在光天化日之下正要抢劫一个民女，他俩就不顾一切地上前解救，父亲从黄包车上抽出僧王刀，只一挥，一个洋头就搬了家。李存义把另两个揪住，也是一刀一个，结果了洋鬼子的狗命，然后把三具洋尸用麻袋装了，抬上黄包车，拉到荒郊野外扔掉。父亲护送李存义继续赶路，一直送到霸县，才与师大爷挥泪而别。

父亲随张占魁等武师学艺到二十多岁，功夫日臻成熟。

在天津名声也越来越大。但他还远不满足，因而他决定去南方云游，遍访名师高手，主要是要寻找我师爷应文天。应文天人称“应侠”，他和北方八卦掌宗师董海川是师兄弟，同是八卦掌师祖红莲道人和铁拐道人的高足。董海川年长应文天十多岁，董海川下山较早，只得八卦奥蕴之八成，便北归将八卦掌推广开来，形成北派八卦。而应文天下山较晚，尽得恩师的八卦真谛，尤其是练就一身反八卦的绝技。应文天一直隐居在安徽雪花山（即九华山），因而授徒极少。中国武林传有“北有董海川，南有应文天”之说。董海川临终前曾嘱咐弟子，有志者定要去拜访应文天。这也是父亲心诚志坚决心南游寻师的缘由。

父亲南游寻师，是得到张占魁老师的全力支持和师兄弟们的赞同的。爷爷对父亲南游虽然支持，但也很想为父亲成亲后再走。作为孝子的父亲对年事已高的爷爷这个心思是理解的，但他实在满足不了这个要求，因为当时师爷应文天已近百岁，必须抓紧访寻；再则父亲也打算乘童子之身到各地拜访名师高手，以增长技艺。爷爷变卖了家产，为父亲备足了盘缠便上路了。故后人为近代武术家立传时，就曾有“韩慕侠三十而不娶，携资寻师走天下”之说。

父亲在南游途中，路过太谷县，拜见了李广亭、宋约斋、车毅斋三位形意拳大师，在他们的悉心指导下，父亲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虚心研习和苦练，形意拳术又有大进。后来，父亲又来到蒲州，拜访了武术名家戴拜陵的后人，也受益不浅。最后，父亲到达了安徽九华山。但，无论怎样苦苦寻找，也终不见师爷应文天的踪影。父亲毫不气馁，宁愿踏遍安徽丛山峻岭，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父亲走遍了高山深

谷，访遍了寺观古刹，后来寻到一座叫“广华山”的山峰，正当父亲沿着崎岖的山路往上走时，忽而听到一阵救命的惨叫声。父亲一看，见一樵夫被一条花白巨蟒紧紧地缠着，非常危急，便提刀一个箭步冲上去，杀死巨蟒，救下樵夫。就在这时，一个拄着拐、跛着脚，散着发的老者邈邈遑遑地走过。父亲一看这老者虽疯疯颠颠，却红光满面，气度不凡，于是便急步追上去，一直追了十几里路，却无论如何也追不上。追到一座庙宇，老者一闪就不见了。父亲进庙一看，一位身穿素青灰道袍的长者端坐在殿中，定睛细看，这位道装长者正是十几里路未追上的那位老者。这，就是应文天师爷。老人家看我父亲为学八卦真功，近三十而不娶，不远数千里来求师，求教心诚，定有雄心壮志，为此甚为感动，愿将所学，悉数传授。父亲后来才知道，应文天师爷虽身怀绝技，但因刚正豪爽，不满当政，看破红尘，才收住山门，来到这山深林密的广华山，自耕几分田地，过着与世无争的超凡生活。

父亲随应文天师爷学艺之时，惊奇地发现他虽已鹤龄之寿，但仍宝刀未老，身手不凡，他的八卦掌、手中的一对子母鸳鸯钺形似蛟龙，敏捷善变，动如闪电，定若泰山，刚柔相济，意境清新。其中一些掌法招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父亲在应文天师爷的言传身教，耳提面命的严格要求下，在广华山又苦练八卦真功四年多。年近百岁的应文天师爷在一天晚上，穿了一套新道服，对父亲说：“你来广华山四年余，我已将八卦绝技无保留地传授与你，了却了一桩心愿”，“望你能象民族英雄岳飞、戚继光那样，为国为民，成就一番事业”。次日清晨，应文天师爷就安祥地去世了。父

亲此时才意识到昨晚一席话竟是师爷的遗嘱。他悲痛欲绝，将师爷埋葬，并为他披麻戴孝，焚香祭奠四十九天。为了怀念师爷应文天，父亲从广华山取回一块晶体石，刻上“广华山应侠老师之神位”字样，涂以红朱，并用玻璃罩嵌装，一直供奉在家里。逢年过节，父亲必亲自焚香叩拜，虔诚至极。

至此，父亲先后拜了九位老师，而应文天被尊为九师之首。为了永志师爷应文天授艺之恩，继承师爷“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遗愿，父亲将“金镛”之名改为“慕侠”。

父亲由一个贫苦农民的孩子，通过九位名师的悉心传授，尽得国术真谛。父亲之所以成名，的确也主要是得益于应文天传以八卦掌上乘之法。父亲又将所学形意和八卦揉在一起，北派八卦与南派八卦熔为一炉，融会贯通，自成一派。日本研究中国武术的专家松田隆智认为：一般以练八卦掌而出名的甚多，但真正称得上名家的极少，而真正的八卦掌名家中兼学形意者可说是全无。著名的武术家金警钟先生在1933年写的《国术名人录》一书中说：“韩金镛，又名慕侠，天津人，自幼好武，曾拜老武师张占魁为师，练习形意拳及八卦掌，技成犹不自满，乃漫游南北，遇名家无数，互相研讨，艺乃大进，后游安徽，得遇八卦掌南方嫡系应文天老师，随之学艺，造诣极深，……故韩之八卦掌、八卦刀、八卦剑、八卦枪、皆甚精熟，为北方八卦门后起之一绝。”

### 三、壮年时期的韩慕侠

父亲遍访名师，习武多年，终得形意、八卦武术真传，成了名震京津的武术名家。成名之后到底要干什么？这是摆在父亲面前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当达官贵人，巨贾豪绅的保镖护院、仆役走夫、官府役隶、马快捕头，还是当一个江湖大侠，洗雪不平？所有这些都不是父亲肯做愿为的。那么父亲追求的是什么？他一贯认为，强种强国必先强兵，他想建立一所武备学堂，用国术来强兵强将，用形意拳术来培养一支具有技击格斗之术的当代“岳家军”，以上保社稷，下卫家园。这就是父亲苦苦追求的事业。

形意拳为南宋岳武穆王所创。此拳精于技击，招数简单，却威力无比，可伸手分高低、见输赢，最适集体冲锋格斗。岳飞曾以此术训练岳家军，大败金兵，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故在金兵中传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之说。因此，父亲把在国民和军队中推广形意拳作为己任。经过深入研究，并察访了当时淮军和新陆军的训练情况，对传统的形意拳术、刀术、枪术进行了一些简化和创新，使之更适合军队近战冲锋格斗。

父亲的师父张占魁和师大爷李存义都大力支持父亲用形意之术训练军队的想法。师徒们经过商量，决定上谏当时清末最后一任直隶总督陈夔龙。陈总督为父亲爱国之志所感动，接见了父亲。但因为办武备学堂需大量财物，一时难以办到，商议后，批准以河北公园为会址，先办一个武士会之类的民间团体，待后逐步壮大再改办武备学堂。

就在武士会将要成立之际，恰好赶上了改朝换代，大清垮台，民国成立。为了使武士会名正言顺，张占魁就去找他的表哥、赫赫有名的冯国璋、冯很热心，表示愿大力相助。终

于在民国元年六月，经教育部、陆军部、内务部考核备案批准，“中华武士会”在天津河北大经路河北公园（中山公园）南头正式成立。冯国璋亲自担任中华武士会名誉会长，并亲笔题了“中华武士会”五个大字，德高望重的李存义任会长，张占魁任副会长。

父亲四方奔走，求助各界，终于使中华民国第一个民间武术团体——中华武士会创办起来了。这里面倾注了他的心血，也寄托着他的希望。建会初期，武术界人士慕名入会者甚多。但也有人对建会的宗旨及所要达到的目的并不明确，认为应把武士会办成只是团结武林同道，单纯为交流武术技艺的一个团体，不同意父亲为推广形意拳训练军队的这一作法。把办武士会做为改办武备学堂的前奏，是父亲想用形意拳训练军队的第一次尝试。由于父亲和多数人在办武士会的宗旨上的分歧越来越尖锐。二年后，父亲离开了武士会，自办了武术馆。这时，父亲和母亲张秀如已经结了婚。

1915年，天津南开学校为增强学生体质，欲新增柔术一课。校董严范荪和校长张伯苓聘请父亲到南开任教。父亲高兴地接受了聘请，并把这次应聘作为在青年中推广普及国术的大好时机。是年3月15日，父亲在南开学校上了第一课——修身课。修身课是对学生进行自身修养教育的，每周一次，每次都由校董或校长亲自上课。而这一次张伯苓校长破例把这节修身课让给父亲，内容是请父亲舞剑，讲授武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父亲走上讲台向同学们行了一个鞠躬礼，然后表演了一趟六合进步剑，精湛的表演获得了同学们经久不息的掌声。舞罢剑后，父亲开始讲课，中心内容是：……当此列强竞争最烈之时，非人人自强不足以立国，非习武

健身不足以卫国，……所以吾辈青年不仅应有高尚的品德和渊博的知识还应有强健的体魄，方能承担强国富民之大任。讲课结束后，张伯苓校长对父亲说：“同学们不但为你的剑术所陶醉，也为你的口才所折服”。

父亲打算在南开学校成立柔术团，同学可自愿报名参加。张伯苓校长对父亲这一打算很是支持。于是，各年级学生踊跃报名习武。父亲兴奋不已。数日后，学生们自办的《南开星期报》（1915年第37期）专题报道了此事：

**“柔术体操：我校于上星期增加柔术一科，丙班体操钟点及丁戊己各班图画钟点皆改武术云。”**

**“舞剑：上星期三，修身班请柔术教员韩慕侠先生舞剑，全校师生甚为欢迎。又于上星期四，成立练习柔术团，师生随意报名，接近世我国人士及世界各国皆以日本之柔术为世界之最佳者，不知我国之武术实高于日本之万倍（韩先生与日本武术会比试，遂知日本之柔术剑术不如我国）。同学诸君共研究之，勿令后进之国高我一筹也。”**

上面《南开星期报》提到“韩先生与日本武术会比试……”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日本柔道九段高手东乡平三郎在天津日租界须磨街学校院内设擂台，要与中国武士比武。父亲本来对比武打擂不感兴趣，可日本人直接向父亲下了请柬，父亲不得不赴约。无论是比柔术还是剑术，父亲都大败日人东乡平三郎，不可一世的东乡平三郎对父亲的武功亦佩服不已。《南开星期报》所提及的就是这一件事情。

父亲离开武士会后，是一面自己开设武术专馆，一面到南开学校任教。后来，因武术专馆逐渐扩大，事情增多，便辞去了南开学校武术教员的职务。有不少南开学校的学生还



继续随着父亲在武术专馆习武，青年时代的周恩来就是其中的一个。

1919年9月，父亲呈书直隶省长，要求为自己创办了三年多的武术专馆立案。父亲在书中说：“侠历任青年会、南开学校武术教员，细考凡武术优良者，其道德学问必见称于侪辈，于是乎始悟体育一道于智德两育有不可须臾离者。但传授一会或一校，范围太狭，不克普及大众，每以为憾，后徇各方同志之请，暂于鄙寓划出房舍数间为义务传授拳术之所。三年以来，学者日众，亟思扩充。侠何敢惜一手一足之劳而负我众同志之望”。

武术专馆的简章如下：

一定名 武术专馆

二宗旨 以普及体育，保存武术国粹，并效法岳武穆之为人宗旨。以忠心爱国为经，以强健身体为纬，造就爱国武术专门人才。

三地点 设在天津河北宇纬路宝兴里拾五号。

四学员 以中国人行为端正者为合格，得经同人或本馆有归者介绍之方能入学。

五学费 不收学费，教员完全担任义务，但欲补助各项经费添置应用器械，可随意捐助。

六分班 本馆分为三班。

（甲）普通班 初来学员得进班学习。

（乙）特别班 因特别原因或公务太忙不克按规定时间到校，可请求入特别班。

（丙）专门班 经过普通班或特别班，并经教员考验见可能深造之才始准入专门班。

**七时间 专门班和特别班学员随到随授，不论时间，普通班每日限两小时。**

武术专馆是设在闹中取静的宇纬路宝兴里一套四合院内。这套四合院是父亲变卖了家产租来的。父亲把这套四合院修葺一新，东西六间厢房分别为男女练功房，正面为迎客厅，后里为寝室、伙房。迎客厅布置得很有气势。迎面一大横匾，书写着“武术专馆”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这几个大字是临时大总统黎元洪写的，并有他的签名。与大横匾对称两边是“韩慕侠武术专馆”的匾牌。客厅中间是一幅达摩老祖画像和一把达摩剑。画像左右有对联一付，上联是剑匣之中有龙气，下联是酒盅以外皆鸿儒。

此外，墙壁上还有两帧巨幅条幅，其中左面一幅是一首古代帝王迎接征战凯旋归来的大将军的诗：

大将南征胆气豪  
腰横秋水雁翎刀  
风吹鼙鼓山河动  
电闪旌旗日月高  
天上麒麟原有种  
穴中蝼蚁岂能逃  
太平待诏归来日  
朕与先生解战袍

右面是赞武当拳法武功武德的一首诗：

六合自古无双传  
多少元妙在其间  
设若妄传无样人  
招灾惹祸损寿年

武艺都是道真经  
任意变化艺无穷  
岂知悟得婴儿顽  
打法天下是真形

另两帧条幅则是描写形意拳和八卦掌武功如何精妙的。  
左面一幅是：

一波未定一波兴  
好似蛟龙水面行  
任尔腾空高处跃  
霹雳一声定心惊

右面的一幅是：

不是飞仙体自轻  
精神为阵气为兵  
挑破神速如闪电  
进退纵横虎豹行

父亲在《益世报》刊登义务授徒启事，声明授徒不讲贵贱，不分男女，也不问工农学商，只要愿意习武，都认真教之，这一新闻在当时引起不小反响。有不少社会名流、名家子弟纷纷慕名来武术专馆拜师。其中有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有曹锟的女婿等等。也有不少南开学校和直隶女师的学生前来学艺。南开学校的学生有周恩来、于文志、梁镜尧、何树新和岳润东等。北洋女师学生有刘清扬，直隶女师学生有乔咏菊、乔咏荷姐妹等等。在当时父亲的武馆收女子习武，使她们能够冲破几千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束缚，不能不说这是惊人之举。

在父亲的女弟子中，刘清扬是第一个主动上门找父亲

拜师学艺的。父亲深为刘清扬的勇气所感动。刘清扬到武馆学艺后，我母亲也甚为高兴，两人在武馆相处，亲如姐妹。刘清扬在女师毕业后，她准备在天津南开一纬路自己办一所大同女校。她找父亲商量办学时说：“我办的这所女校，凡是要求入学的学生，不许缠足，不穿旧装，要留短发，穿裙子，不但学文化，学西方文明，还要习武。如果先生同意，我想聘先生为我校武术教员。”父亲非常高兴地予以应允。父亲还动员母亲到女校的妇女补习班学习。后来，刘清扬赴法勤工俭学，行前送了一张她和一个觉悟社女社员的合影给父亲留作纪念。刘清扬后来成了我国著名的女革命家（解放后任全国妇联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务）。

经刘清扬串联后介绍给父亲的两名女弟子乔咏菊、乔咏荷是姐妹俩。他们是直隶女子师范的学生。这“二乔”的父亲是天津敦庆隆绸缎庄的大老板、天津火车站站长、会讲六国语言的开明绅士乔哲宋。乔哲宋是我父亲的好朋友，平时就经常有来往。“二乔”习武很能吃苦，进步很快，论武功，她俩是父亲女弟子中的佼佼者。后来她们俩也分别走上了革命道路。

父亲众多的弟子中，要属周恩来最受大家的钦佩和尊重。他思想维新，胸怀大志，尊敬师友，刻苦练功，他给家姐的印象也最深，家姐说：“这并不是因为周恩来是我们的开国总理才这样说。而是因为他对我最和气、最好，故我最喜欢他”。下面，是小侠姐对我讲的回忆我家和周恩来交往的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住在天津河北元纬路元吉里他的伯母周杨氏家，离我们的武术专馆很近。胸

怀大志的周恩来练武，一是为了健身，二是为体察民情，因为到武术馆练武的是什么人都有。周恩来常常在学校一下课就到武术馆来。当时小侠姐仅四岁左右，很淘气，总喜欢跟着师哥们后面模仿他们的动作。师哥们嫌侠姐碍手碍脚，都“去、去、去”地赶她，惹得侠姐常常撇着嘴不高兴。但周恩来就从不赶她。周恩来练八卦掌是非常刻苦认真的。常练得汗流浹背。侠姐就是喜欢跟在他后面模仿他走八卦步。两只胖胖的小手一招一式地煞有其事。周恩来也总是高兴地把侠姐举起来，一边在空中旋转，一边说：“我长劲儿，你长个儿！”休息的时候周恩来还总抱着小侠姐，指着墙壁上那首皇帝迎接凯旋将军的诗说：“小师妹，这首诗写得真好啊，我教你唱。”周恩来哼起很好听的调子教侠姐唱起来：大将南征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唱得好听极了，直到现在八十岁的侠姐还常常不知不觉地哼唱起来。

第二件事情，我家几代都是单传独苗。父亲近四十岁仍未得子，继车振武之后，将我二姑妈的长子也过继过来，取名韩幼侠。韩幼侠与周恩来年纪相仿，两人便一起练功，但韩幼侠远不如周恩来吃苦认真，尤不愿做那些基本功训练，父亲常批评韩幼侠说：“你看人家翔宇，肯下苦功，就长功夫。”有一次，父亲实在气不过，打了韩幼侠一顿，并罚他面对墙壁举铁棍。韩幼侠累得大汗涔涔，周恩来就代他求情：“韩先生，饶过他这一次吧，我们再认真练。”父亲见周恩来求情，就饶过了韩幼侠。后来两人练功进步都很快。

第三件事情。父亲是义务授徒。他说：“武艺是祖先一代代传下来的，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到的”。因此，他教武不收学费，一些家境贫寒的弟子，不但不用交费，有的还吃住

在武术馆。武术馆兴旺时，吃住在武术馆的多达几十人，而且因练武消耗大，吃得多，还要吃得好。“穷文富武”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而父亲不宽裕，靠什么维持武术馆呢？一是父亲的名气大，资助者不乏其人。二是名人的子弟拜师时送厚礼，父亲也不推辞。比如袁克定第一次拜父亲为师时，就送上了一只纯金的小金马和一小箱银元。侠姐说：父亲只要手头一宽裕，过年时就在桌面上放着一个盘子，盘子上放满了两块为一摞的银元，谁家有困难，只要说一声，就可拿走一摞。父亲的师弟、著名的武术家和武术著作家姜容樵在1930年所著的《当代武侠奇人传》里写道：“他（指父亲）生性任侠，轻财仗义，慷慨好施、毁家荡产也不在乎。直到现在还是这样老脾气，哪怕穷得一文也没有，也不肯说一句含糊话……要问他的拳脚本领，称得起一代宗师。”

父亲有两个师兄，一个叫刘锦卿，一个叫刘潮海，他们平时和父亲一起在武术馆授徒，吃住都在武术馆内。有一年临近年关，刘锦卿没有到武术馆来，父亲正纳闷，忽见刘锦卿的妻子哭着跑到武术馆，父亲一看知道情况不妙，跑到刘家一看，原来刘锦卿因没钱过年，一个堂堂武术家养活不了妻儿老小，一急之下就要自缢，幸亏被邻居救了下來。父亲安慰了师兄一番，回武术馆取出几块银元交于刘妻。在送刘妻时，忽然看到周恩来正抱着侠姐在玩耍，便把侠姐接过来，要将她手上的银镯子哄下来送给刘妻，并嘱咐送到金店兑几个钱用。可是，侠姐年幼不知人世艰难，又哭又闹，说啥也不肯，这时周恩来急忙耐心地对小侠姐说：“小师妹，咱不戴那个，戴那个勒手，怎么练武啊！”侠姐平时最听周师哥的话，于是小侠姐就很不情愿地把银镯子摘了

来。

第四件事情。民国六年正月十二日是父亲四十岁生日。曹锟、冯国璋以及天津各界名流都驱车前来为父亲祝寿。父亲一再对弟子说：“不要买什么礼物，买点花炮放放就成啦。”傍晚时，父亲和众弟子来到院心，在欢乐中放烟花鞭炮，周恩来抱着小侠姐，侠姐看着五彩缤纷的烟花，高兴得手舞足蹈，突然侠姐的衣袖内冒烟了，手臂一阵灼痛，便哭喊起来，周恩来“哎呀”一声，赶紧把侠姐身上的火星扑灭。放完鞭炮，父亲和众弟子共进便宴，然后在室内寿字中堂前，一起合影留念。

周恩来能按照我父亲的指教，对自己练功非常严格。站桩是形意、八卦武术的基本功，一站就是个把钟头，一动不动。站的时候，头、肩、腹、胯、腰、手、肘、膝、足及意念都有严格要求，非常枯燥，非常吃力。一些弟子总是轻视这些基本功训练，急于学习技击套路招式。而周恩来则遵照父亲指授，一丝不苟地认真去练。练完功之后，别人都纷纷离去，周恩来常单独留下与父亲叙谈，论时局，谈前途常到深夜。一次，父亲忽然想起祖莹尚无堂名之事，便要那些来自南开学校的弟子给起个堂名，有几个学生说了父亲都不甚中意，周恩来沉思了一会儿说：“韩先生，您不是共拜了九位师父吗，我看这堂名就叫“韩九师堂”吧。您看可不可以？”父亲听后细细品味不禁连连叫好。于是，父亲请来石匠，刻了三块“韩九师堂”石碑埋到莹地里。周恩来以勤奋好学、刻苦练功博得父亲的喜欢，更以忧国忧民、宏伟志向取得父亲的信赖，他们既是师徒，又是知己。

有一次不等周恩来练功，父亲便把他叫到客厅，从

柜子里取出那把十分珍爱，不轻易示人的宝刀——“僧王刀”递与周恩来说道：“翔宇，这是僧格林沁所用的战刀，这把刀我是轻易不肯拿出来的，今后你就用它练功吧”。周恩来接过刀来一看，寒光闪闪，锋利无比，果然是少见的一口宝刀。这把刀周恩来一直用了三年多。1966年“文革”破四旧时因为是总理使用过的宝刀，才被派出所保留下来，返还给我侠姐，可惜其他长短器械均被当做四旧一扫而光了！

后来，周总理逝世后，他的警卫员孙吉树同志曾到小侠姐家中叙谈，他对家姐说周总理的形意八卦功夫直到建国后仍很深，警卫班练擒拿时，总理常给他们纠正动作，高兴时还为他们练一趟八卦掌。

父亲有一个弟子叫岳润东，是比周恩来晚入学一年的南开学校的学生。当他来武馆拜我父亲为师的那一天，父亲得知他是岳飞的后代，非常激动，竟让他腿点地下拜。父亲平生是最钦佩岳飞的。岳润东的父亲是个庄稼人，我父亲对老先生也非常敬重，彼此成了莫逆之交。岳润东到武术馆后，父亲把他当亲儿子一样，言传身教，并承担他一切学习、生活费用。岳润东在南开学校毕业后，父亲鼓励他不忘先祖，于是他便毅然投笔从戎了。

父亲对来武术馆从他学艺的众弟子都能做到沥血传真技。父亲说过，凡是来武术专馆习武的学生，我必尽心竭力，因材施教，传以真技，绝不误人子弟。因此，父亲总是言传身教，授之拳术，讲明拳理，演示实战。这是一般保守拳师所做不到的。所以使随父习武者能在短期内心领神会，学得真谛奥蕴。

父亲自办武术馆，授徒传艺获得成功。对此虽深感快



慰，但时刻未忘在国人中推广国术，于是，他要他的弟子于文治、梁镜尧（此时周恩来已到日本留学了）等南开学生起草《敬告国人练习形意拳提倡武术书》，在报上发广告，号召大家学形意拳国术。此书稿尚保留着，抄录如下：

举国昏睡，行将倾陷。有清醒之脑筋者，惟今日青年之学生；有纯洁爱国之思想者，惟今日青年之学生。时事螭螭忧心为捣，学生安能不急起而为爱国之事业乎。然而学生在修学时代，欲为爱国之举动，德育智育而外，尤赖体育以施引爱国之术。特培养体育，决非学校数小时操法所能收效焉，当以其为练习形意拳乎。考此拳传自岳武穆，精于攻击……韩慕侠先生幼精此道，壮游江湖，与国中各门著名武士相研究，未遇有出其右者……先生不惟艺精而且志大，常恨习斯道者不知珍重，多有为个人之护役走夫。先生每欲痛洗此卑污之思想，提高武士之人格，推广武术之应用，变个人之护夫为国家之干城。尝欲创立武术学校，俾国人皆得斯道，以备御敌人之用。惧恨力不足，和者乏人，有愿难遂。但先生此志愈久愈壮，未尝稍懈。今拟甘尽义务，广纳来者。碍限于地势，不能容集多人，如有志愿练习此术者，即来宇纬路韩寓练习，亦无任欢迎之至。而助先生之教授者，有李君存义、张君占魁，车君泽武、张君振声、刘君潮海、刘君锦卿、诸君皆精武术者也。鄙同人等承先生之意，特迎周知。阎鸿业 韩介侯 李公九 迟华章 刘萌枢 赵恩元 何树新 梁镜尧 于文治 刘元善 同启

广告一登，果然又有多人前来练武，父亲很是高兴。

父亲在办武术专馆之时，仍念念不忘为强国强兵，建武备学堂。从退出武士会起，壮志一直未泯。民国八年（即

1919年），父亲上《万言书》于当时的代大总统冯国璋，恳请冯助他创办武备学校。父亲写《万言书》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于是他先从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写起：

“冯大总统台鉴：向仰光霁，时申钦慕，企德怀风，惟日久矣。今仅以委质之愚诚以近渎左右。窃尝怪欧战告终以来，当此和平会开幕之际，而美国以和平首倡之国，反大扩海军军备。其他如英法各国，亦未尝稍减其武事。至日本更日孳孳于军备，若有不足者。似此世界所谓和平直梦想耳。和平既不可期于今日，战事定见于将来，欧洲虽终于战，亚洲将陷于争。弱肉强食早为天演，强权公理已成公例，以中国之危弱，能与人旋持于战争乎？苟不速谋自强之道，犹事纷攘不已，难免分灭之祸矣。欲强中国策，当出于清内乱，除个人权利之争，共为同舟之济，然后协力对外，庶国可强，然著此奇功，必先求根本之计。根本之计，要在造就武备人才，培养后进。人才已足，然后振兴军备，军备已缮，其他事业自相形而作，中国自因而强也。但人才之造就，须设立武备学校。学校广立，人才自应不贫于求。侠也不才，尝以此为怀”。

父亲以他自己从武二十多年的体会，深信形意拳术的威力是巨大的，他在《万言书》里继续写道：

“于是知武术一道尽于中国形意拳矣。始悟洗病夫之耻者斯术也，救中国于危亡者在乎此也，故侠敢云此拳用之于战争，能操最后五分钟之胜利。侠尝谋提倡此道，使国人尽得斯术，以为强国御外之计，此侠之素志。想我公果俱此志，当此纷攘之际，正可展其怀抱，谋强国之事业立功之”。

尽管父亲有尚武立国的满腔爱国热情，但也知道自己势

孤力单，他的抱负可能实现不了，然而他觉得虽败犹荣。于是他又写道：

“却彼强敌，安我族类，措国家于泰山之安，登斯民于社席之上，此乃万世不拔之尊荣。侠尝谓匹夫奋于草野，虽败亦荣，因非其志不坚，乃力不足耳。故后世未尝埋没失败之英雄。如位极至尊者力足以有为而无所立，此真有失败之耻矣！宜后世无闻焉？公若不乘此良机竭力图功，则时乎时乎不再来也。”

为了表示赤诚的心，父亲在最后写道：

“侠本武夫，颇明大义，不有所恃，焉敢大言以欺我公。如公以侠言有可采，倡立武士学校，侠甘愿竭其绵薄以效公命。至谋衣食之计，求升斗之禄，侠虽贫寒，非所志也。前者王公芝祥、陈公光远、吴公光新，曾以函招，许以位置，皆谢而不就，盖因志不同也。晚食当肉，颇安温饱，日与二三知己往来研究拳术，颇快意志诚。……”

然而，《万言书》呈上之后，犹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当时的北京政府，正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段祺瑞、曹錕等“你方唱罢我登场”疯狂争权夺位的时候，谁能顾及建什么武备学堂呢？冯国璋很快被徐世昌赶下台，转年即歿，父亲的抱负终成泡影。父亲每讲到此事时都悲愤地说：“我空有爱国心，却无报国门，有愿难遂啊！”

韩慕侠武术专馆誉满京津。1918年夏天，天津博物院召开了北方各省著名武术家武术表演大会。应博物院院长华学涑先生之邀，父亲率武馆众弟子参加此会。大会开幕时，人山人海，连那些外国驻天津使节也都纷纷前来观看。武术表演开始时，数十名武术家不分派别、拳种，都亮出了自己的

拿手功夫进行精湛表演。当轮到父亲的女弟子乔咏菊、乔咏荷表演时，把大会推向了高潮。第二天，报纸以《击技精熟》为题进行报道说：

“武术馆击技之部约女武术家乔咏荷、乔咏菊二女士到馆演技，已志前报。

昨日，二女士练习剑术、拳法各一次，二女士所练，剑法纯熟，拳法精稳。在场诸君，无不击掌称赞。吾国女子素弱，近年始于体育稍事研究，此次得二女士如此提倡，则女界尚武之风，将来必异常发达矣。”

父亲在大会上表演了形意拳、八卦掌、双头蛇和连环枪。还应博物院院长之请，在热烈的掌声中，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演讲，由国际战争讲到国内武术之弊端，武术之重要、武术救国之至理，亦讲了武术界如何求同存异，共谋大业的愿望。历时一个月的武术表演结束后，天津博物院根据各武术家表演，颁发了用苍玉所制武士奖章数枚。父亲所率与会的十三名弟子均获武士奖章，博物院而独以武师奖章赠与父亲。

事后，父亲的弟子、南开学校学生梁镜尧特制插屏一帧，真实地记录了这次盛会。文曰：

民国七年夏天津博物院开成立展览大会并召集北数省技击大家数百员萃于一场演习武术一月以资互相观摩技擢其尤名曰武术馆博物院院长华君学涑邀请慕侠先生先生率男女弟子莅会先生每演习全场肃然目为之眩尤以先生所传女弟子两乔女士为全场生色纠纠武夫退避三舍中外来宾叹为观止闭会后男女弟子得武士奖状者十有三人以先生非特个人武术精娴且所授弟子均为全场称许是以知先生不独以武术

见称且能以道德气节感化其弟子故有此成绩也又知 先生不  
只能教授男生而且能传之于女子也故博物院特赠 先生玉牌  
一面镌文曰武师玉篇曰师范也书泰誓章曰作之师礼文王世子  
有曰出则有师也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此所以称 先生  
不只以武士之名而尊之曰武师也说文曰玉有五德润泽以温仁  
之方也触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  
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洁之方也夫牌以玉为质是喻  
先生仁义智勇洁五德俱备也

民国十年一月八日梁镜尧撰海阳周予孜书

这帧“武师玉”插屏以及父亲获得的武师苍玉牌，我们至今仍保存完好。

1918年，一掌击败俄国大力士康泰尔这一历史事件，是父亲壮年时期的一大壮举。

康泰尔何许人？为何来到中国？康泰尔是俄国拳师，二米多高的个头，身高力大，他自言力能扛鼎，具有一万四千磅的力量。他除了力大外，还苦练拳术多年，自诩为天下无敌，在俄国革命前夕，康泰尔为了达到称雄世界的目的，带上夫人作环球旅行。每到一个国家，先进行武技表演，再进行拳术和拳击比赛。他走了十余个国家，势如破竹，场场胜利。不到两年功夫，他打遍欧美四十六个国家，没输掉一场。于是康泰尔得到了“震环球”、“世界第一大力士”的美誉。中国——是康泰尔环球旅行，荣归故里的最后一站。康泰尔知道中国是武术之国，中国武术为世界最上乘，他要与举世赞誉的中国武士角力，来显示他的“震环球”、“世界第一大力士”的美名是货真价实的。

康泰尔到中国后，先后在上海、浙江等地表演和角力，

最后来到了北京。到京后，他下榻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最豪华的第一层第二套房间里。稍事休息后，康泰尔就到当时最大剧场前门外第一舞台进行表演。表演第一天是1918年9月3日。表演第一个节目是“扎钉”，康泰尔把十多枚长长的铁钉一枚枚用手“扑！扑！扑！”地拍进一块木方里，然后再用手“吱！吱！吱！”地拔出来，康泰尔还得意地“咔”的一声把一枚铁钉折为两截。第二个表演节目是“蹬石磨”，康泰尔在舞台上撒一层碎玻璃，然后赤背躺在上面，手托一盘石磨，脚登一盘石磨，最后是上来十个人，五人一拨分别爬到石磨上，康泰尔却纹丝不动。第三个节目是康泰尔最得意的一个。他把一条长长的铁练绕在脖颈上，铁练的两头远远甩在左右两边，三十名汉子分两边，拽住铁练用力猛拉，象拔河比赛一样。铁练咔咔作响，环环入扣，康泰尔被拽得面红耳赤，眼球外鼓，突然，康泰尔大吼一声，将头向左右一摆，两边的人登时趑趑趑趑站立不稳；接着他向后退，头猛然向后退，那三十名汉子便撞成一团，纷纷倒在康泰尔脚下，康泰尔却狂笑不已。他这些表演，无非是吹嘘自己力大无比而已。一连表演数日，盛况空前。康泰尔更加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于是便利令智昏地要在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五色土”举行环球大力士第二次赛武大会。“五色土”是个平平展展的土台子，据说由五种颜色泥土构成，代表整个国土，是历代皇帝祭祀的地方。康泰尔选择在“五色土”比武，就是为了让世人看看他是如何在中国皇帝祭祀的地方打败中国武士的。那么，为何叫环球第二次赛武大会呢？因为先前已举行过第一次了。第一次大会情况如何呢？1918年9月12日《顺天时

报》有过简短介绍：“西历一千九百零八年，万国大力士在英属非洲比武，与会者共有十四人，是日欧洲各国电报均停止四小时以候胜负之信，各国人民之环候于各处电报局者共有数百万人之多，足见西人之尚武精神何等注重。”

康泰尔决定举办第二次万国赛武大会，于是就电邀各国力士与赛，不久，康竟收到二十余个国家的力士回电，表示准时参赛。9月13日《晨钟报》刊登了一帧二十多个外国参赛大力士的照片，身高体壮的康泰尔站在正中，各国大力士双臂抱胸分站于康左右。康泰尔主要是想与中国武士角赛，但当时中国没有官方的武术组织，只有天津中华武士会唯一的一个民间武术团体。于是，康泰尔便致函邀天津中华武士会与赛。在比武之前，康泰尔每天还在“五色土”表演一场。

为了给第二次万国赛武大会造声势造舆论，从9月11日起，北京不少报纸头版都刊登了赛武大会的广告。其中，《顺天时报》的广告最为详尽，在头版正中：

### 中央公园

### 万国赛武大会

(阳历九月十四日星期六十五日星期日十六日星期一)

▲环球大力士第二次赛武大会

▲与赛者共有二十余人之多

▲本会预备小金牌十座大金牌一座

▲请看鹿死谁手

……今康君由俄来华，历游沪、汉、津各埠，无不欢迎，前数日在第一舞台献技四天，所献各技均属空前绝后，

警人视听，当康君在该舞台演技时，各国及中国武士之欲与较量者实繁有徒，康君以该舞台地方狭促，恐有性命危险之处，况未得各该国领事准许，未敢应允，今康君鉴于欲与较量者之多，当即拍电约集各国大力士假座中央公园开万国赛武第二次大会，凡各国及中华人士之有力者均定于此数日内到会与赛，诚世界武术之大放光明也，千载一时，幸勿交臂失之，当知二十世纪享世界无敌大力士之盛名者固属谁氏。

外请双石少林五虎各会加放广东焰火、新奇电影，并放大气球、文明新戏。

（每日下午一点开会，十二点散会，门票概售一元，日夜只须买一张票。）

以上就是《顺天时报》的广告内容，可见当时赛武大会热闹非凡。

《晨钟报》广告还补充说：

“敬启者凡中华同胞欲与会比武者，请先与中央公园事务所接洽。如本人不愿出名者，本会预备有黑纱假面具，本会亦不将其姓名宣布，有欲于比赛胜后，宣布姓名亦可办到。”

天津中华武士会接函后即商与赛大事。我父亲原是武士会创始人之一，后因自己办武术专馆退出了武士会。参赛之事本与父亲无关。但因父亲武功好，故中华武士会会长李存义和张占魁多次到我家邀父亲参赛。后父亲谈到此事时说：

“侠虽不欲问其事，但事关国体，义不容辞，遂允与往赛。”父亲时年四十二岁。母亲知父亲参赛后，心情既兴奋又担心，母亲知道父亲武功绝伦，获胜的可能性很大，胜了既可为国人扬眉吐气，又可光宗耀祖。但她心里明白，打



播毕竟有性命之虞凶吉难测啊！她天天在焚香祷告。父亲临行前，再三嘱咐母亲不要流泪，不要送行，不要惊动众弟子。然而父亲进京打擂之事弟子们早就传开了。出发那天，随他练武的南开、北洋女师的学生请假来为父亲送行，他们依依不舍地紧随父亲到天津北站，直送父亲登上进京的列车。天津武士进京与赛之事9月13日的天津《益世报》报道说：

“此次中央公园开万国赛武大会，所邀集各国大力士共有七国二十三人，均系著名武士。天津中华武士会以吾国武术一门最为擅长，未便他让，已于前日约山东等武士五十余人到京，欲与各国力士一为较量，闻中华武士会会长李存义已七十余岁，门徒极多，此次来京，必与各大力士决一雌雄。”随后《益世报》又写道：“王俊臣、李剑秋、张远斋、韩慕侠四人武技最精，被公推为角赛领袖。”

父亲进京以后，一个人径直向中央公园走去。父亲对打擂之事未敢有丝毫的轻敌，他是按我国古代兵书去做的：

“两师未合，先候敌之情，故其愚智偏才皆可见之”。父亲来到“五色土”，台下站了很多人，台上空无一人，康泰尔等还未到。父亲见台上有两个大木箱，知是康泰尔表演的器具，他一跃而上，搬动木箱掂掂重量。不一会，康在众洋力士的簇拥下趾高气扬地来了。父亲在台下看康泰尔表演，见康果然力大无比，不由心里暗暗吃惊；又仔细察看了康的动作，心里便又有数了。看后便回了投宿的华兴旅馆。

就在即将开始比武时，中华武士会到中央公园大会事务所签到后，派代表王亦韩武士与康泰尔谈判比武条件，康泰尔心想中国人个头小，只要我抓住你，不管你武功多高，也休想活命。于是他提出比武以将对手携起抱持三分钟者为

胜，王亦韩根据众武士意图提出：双方比武必须在五分钟内决胜负，死伤勿论。康泰尔先是一愣，然后哈哈大笑，连声说好、好、好，双方拟定了一份生死文书。

自康泰尔签定生死文书后，被我中华武士为国争光的凛然正气所震慑，甚感惶恐与后悔。于是他送厚礼勾结当时的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军统领李长泰，强行把比武改为演武，所谓演武就是通过各自的表演区分高低名次。9月16日的北京《顺天时报》写道“天津中华武士会此次应万国赛武大会之召，到京参与原拟与俄国大力士康泰尔君比赛，为我国武术大放光明，不意临时奉警察总监之令，谓中华武士到京与赛，热诚爱国之志甚可嘉，但比赛武力势必不能相让，恐有生命之虞，故许改为演武。”康泰尔想得很美，他想在演武中通过他的气力和金钱收买，既保住他世界第一大力士的美誉，还可席卷大会设置的十一面金牌荣归。

众武士及我父亲对警察总监等人的无耻行径强烈不满。父亲愤然地说：“生死何足惜，倘不一角，致康君携奖而归，直视我国为无物矣！”父亲提议这擂不打也得打，警察厅不让，咱们就到六国饭店去。于是，父亲与师父张占魁、师大爷李存义、师弟王俊臣（时任保定高等师范学校武术教员）四人当晚八点多钟直奔六国饭店去会康泰尔。

康泰尔听到中华武士会的武士找他，料到是有关打擂之事。见面之时，康泰尔故作热情，说了声“你们好！”便伸出手来欲与走在最前面的父亲握手，父亲刚要伸出手去，突感对方有诈，于是还了一个中国武士常用的双手抱拳礼。康原想趁握手时，把对方的手骨捏碎，不料父亲急中生智，使康的阴谋成了泡影。互相通报姓名坐下后，父亲问康，为何要

将比武改为演武？康推说是警察总监不准，奈我何事。接着便谈到武术之事，康先吹嘘自己武术如何了得，未遇敌手。父亲针锋相对地谈了中国武术如何之精妙，并对康说：“如果较量的话，不用我师父和师大爷，我只用一只手便将你击倒，而且让你不知是怎样被打倒的。”康泰尔轻蔑地一笑说：“韩先生是否在儿戏。”父亲马上说：“康君如若不信，可马上一试如何？”康泰尔勃然大怒，斜视父亲一眼，咄咄逼人地说：“你个头太小，一动手，我抓你，就象抓一只小鸡一样，不抗打！”其实，我父亲个头一米八多，在我国是高个了，就是在外国也算是中等个头了。面对康泰尔的猖狂，父亲反唇相讥地说：“我没有金刚钻，也不揽瓷器活，我平素专打大块头，我摔你，就象摔一只死耗子一样，不费劲！”康泰尔一听气得哇哇怪叫，象一头发怒的凶狮，在房间拉开架势，准备拚命。他向父亲喊道：“韩先生，请进招！”父亲沉静一笑说道：“还是客人先进招！”怒不可遏的康泰尔一个左直拳朝父亲打来，父亲向旁一闪，把这致命的一拳避开了。康见第一拳落空，霍地伸出了右手，直奔父亲的咽喉掐来，几乎同一刹那，父亲用八卦掌的“挑掌”往上一撩，康泰尔这一凶招落空。他更红了眼，翻手就抓父亲的手臂，康泰尔想凭自己身高优势，只要将父亲抓着，悬于空中，任你有天大本事也无济于事，然后再把你摔个半死，这也是他周游世界角力获胜的诀窍。然而，我父亲也早就想好了对策，康泰尔虽力大无穷，而他致命弱点是笨拙，反应慢，跟他比武，灵活、快速就可智胜。当康泰尔伸手要抓父亲手臂时，说时迟、那时快，父亲就在这一瞬间，用左手仰掌延康的右臂向前一穿、一缠，顺势一掳，就

将康的右臂带入怀中，这时康猛力向回挣右臂，父亲趁机用了一个“八卦转环掌”架起康的右臂，左脚向前一个“趟泥步”，致使康泰尔脚下无根，这就是父亲教学中常说的与别人交手时的绝招，使对方脚下失重，只剩一条腿，自己变成了“三条腿”意思就是使对方重心不稳。就在康泰尔身形一晃，失掉重心之时，父亲运用“天魔小丑皆罢休，铜墙铁壁一齐摧”的“颤掌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碑劈石之力，双掌如“虎扑形”重重地击在康泰尔的前胸华盖穴上，父亲的颤掌掌力同康泰尔夺臂之力合在一起，轰隆一声，康应声而倒，跌出丈外，如半堵墙壁坍塌下来。康泰尔“呀”的一声惨叫，呕吐不已，晚餐的美食全翻吐一地。康泰尔仰面躺在地上，动弹不得，只剩下喘气之力。父亲喝叫康泰尔站起来再继续比试。父亲之所以要再比，缘万国赛武大会大小金牌十一面，能赢康泰尔一次奖一面。父亲十一面金牌都要，故非与康泰尔比武十一次不可。康泰尔连连求饶，表示认输。父亲当即令康把世界第一大力士标榜撤消，十一面金牌全数让与父亲。父亲他们得胜离开六国饭店，已是深夜了。

我长大后曾问过父亲，当年为何能不过三个回合就把康泰尔打败？父亲亲口对我说：“康泰尔的力气虽大我四倍，可我的速度快他五倍，他焉有不败之理。”每当谈起此事时，父亲当时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

父亲击败康泰尔的第二天，北京各报含蓄地登载了中华胜利消息。《顺天时报》写道：“……并转述俄国大力士之意，谓久佩中国武术之精，不须比赛亦早已心服云云……”同一天的《晨钟报》说道：“迨至前日，康等遂一败涂地，

虽未详战胜康等者为何人或即为某等，亦意计中事也云云”

父亲击败康泰尔的第二天，也正是把比武改为演武的一天。那天“五色土”人山人海，警察总监等一大帮达官贵人也在场。康泰尔不敢露面，中华武士会的武士硬把他“请”了出来。演武之前，先由中华武士会的代表王亦韩发表演说，王亦韩在演说中谈到了中华武士会此次到京宗旨有三端：“首在与康大力士比武，为我国武术大放光明；次则此次赛武所得抽成之款愿助捐徐属兵灾，故勉尽义务以助诸君雅兴；三则与京师人士提倡国粹，振我中华……”。

王亦韩演讲完毕，演武开始。首先上场表演的是刘楚轩的八式拳，卞蠡洲的十二洗锤，两人的精彩表演引起台下掌声四起。接着是韩怡庵的连环枪；秦月如的六合枪、四门龙形朴刀；齐励学的虎头钩；李呈章的连环拳、拦门枪；李剑秋的八式拳、青刚剑；李星阶的新形剑、拆拳；勒振起的杂式锤、十绝剑；张世广的八卦双刀，李子杨的锁口枪、行步六剑；王俊臣的进步六剑；张福仁的双戟；韩慕侠的四把拳；王俊臣、张世广对击三才剑；赵华亭的八卦刀；胡仲三的春秋大刀；胡仲三、张福仁的地趟刀……表演一个接一个，叫好声一阵连一阵。中华武士会表演最后一个最精彩的节目是我父亲徒手夺双刀。首先出场的是著名武术家张世广，他手持双刀，在舞台上舞耍起来，寒光闪闪，满场生辉，观众掌声阵阵。随后，我父亲一个旱地拔葱跳上台与张世广对打起来，只见一个手持双刀连杀带砍，咄咄逼人，一个赤手空拳，翻腾跳跃，有攻有守。两人厮杀几十回合仍不分胜负。徒手夺双刀本是我父亲最擅长的，可今天他的对手是著名武术家，加之擂台狭窄，双刀总是夺不得，可张世广也伤

不着父亲一根毫毛，观众无不鼓掌欢呼，场上气氛达到了白热化程度。9月16日的《晨钟报》报导说：“又有一中国武士以空手夺双刀，因台上地窄，不敷施展，故虽未夺得而武技已甚佳，康力士观之大为咋舌。”

中华武士会演武半小时后，外国武士开始表演。康泰尔表演了两个节目。第一个是举铁球，他大吼一声把一个号称一万四千磅的巨大铁球举起，并在台上来回走动，显得不怎么费力。第二个节目是举钢轨，他先把一根丈余长的钢轨举起，再每端各攀上五人，然后绕台走了一圈。康泰尔在台下阵阵叫好声中下台。康离去后，一个叫王贵臣的武士跳上来，围着“一万四千磅”的铁球看看、敲敲、踢踢，他一弯腰，居然也把铁球举了起来。他又将铁轨举起，每端攀六个人绕台走了数圈。接着他又朝那堆千余斤铁链走去，用力一拽，将铁链拆为八节。原来铁球是木制的，外边包上一层铁皮，重量只有几百斤。铁链有多节是锡制的。王贵臣武士大声笑道：“诸君，这些玩艺全是假的，康力士尽赚人！”话音刚落，又有好几名军人上台，举铁球，折铁条，哈哈大笑，顿时场内乱作一团。羞愧万状的康泰尔想乘会场大乱逃走，此时父亲一跃登台，大喝一声：“康泰尔，哪里去！”康一见我父亲，即瘫软在地。父亲要求康泰尔把昨晚被打败的情况当众作一说明，康连连答礼说：“我这就说，我这就说。”他慢腾腾地站了起来，看我父亲不注意，趁台上台下乱作一团，突然从插台席缝间溜走了。父亲见状一笑，也不追赶，此时台下观众看得真真切切，全场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喊。至此，第二届万国赛武大会就这样结束了。

父亲他们在离京和到津时，都受到盛大的欢送和迎接。

著名的武术家金警钟先生在1933年出版的《国术名人录》中写道：“韩离京时，欢送者甚众，抵津时，欢迎者尤众，可谓荣矣。”父亲回津时，母亲带着五岁的小侠姐，与父亲众弟子一道至天津北站迎接父亲凯旋归来。当时，整个站台人声鼎沸，鞭炮锣鼓齐鸣，盛况空前。

康泰尔在返回俄国前夕，与夫人一道曾至天津拜访我父亲，他因无我家的地址，便找到了中华武士会，见到了李星阶武士。康泰尔对李星阶说，赛武交了朋友，他拜访韩先生，就是想与韩先生交个朋友。李星阶武士出于对夷人的鄙恨，讥笑地对康泰尔道：“你还要跟韩先生交朋友，他正找不着你，他还要打死你呢！”康泰尔一听，无可奈何地走了。

康泰尔离开天津时、煞费苦心地炮制了一份《致中华武士会书》送到天津《益世报》，在1918年9月29日全文登出，编者在标题下面用括号括上“无赖”二字，以示嘲弄。全文如下：

#### 《俄国大力士康泰尔致中华武士会书》（无赖）

中华武士会诸君公鉴：鄙人远来贵国，开万国赛武大会，本欲以角力斗技增美誉，而播荣名。不意铁球铁轨诸把戏为诸君觑破，以致一鸣铙羽敛翼而退，不敢请试他题。然谓鄙人寡识而退让则可，谓鄙人贻羞于失败则不可缘。鄙人虽远隔数万里，稔知贵国事事皆有名无实，警察厅所以保民则反扰民，军队所以卫国则反乱国，官僚所以敷政治而如散瘟灾，政府所以安国家而备施荼毒，开国会代表民意而民意倍见摧残，称共和为民权而民权愈遭蹂躏，如此种种，更仆难数。总之，贵国之事无一名实相副者。鄙人因此以为贵国之武士会亦必如其他各物，事率皆虎皮麟植，徒有其形，虽

似磨砺以须，不过银样蜡枪头而已。故思以假应假，博得虚名，名盛而利即随之，足已与贵国伟人相比较，初不意贵会诸君皆能求实，认真，高出他界远甚。鄙人佩服之，恭敬之，故甘心退让，成诸君美誉，以稍增贵国光也。谨布片言，诸维朗察。

### 俄国 康泰尔启

我父亲战胜康泰尔赢得的十一枚金牌全部献给了中华武士会。经过武士会研究，为表彰父亲的功劳，决定把大金牌赠送给父亲。其余十面小金牌按照父亲的意见，存于武士会，俟后有与外人较胜，以此奖之。10月10日，武士会开庆功大会，由会长李存义把大金牌赠与父亲，并亲手将其缀于父亲的上衣之上。下午，父亲携大金牌回武术专馆，弟子们个个扬眉吐气，眉飞色舞。随后，大家提议请河北公园照相肆摄影师到武术专馆照相留念。父亲靠正中八仙桌上首坐下，桌子上于中间端端正正摆上大金牌，再上方是达摩剑和达摩像。侠姐立于父亲身前，众弟子分立于两侧。七十多年过去了，至今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我家还完好地珍藏着。

河北公园照相肆拍完照后，为了广为宣传这一光荣事件并借以招揽生意，他们把那张照片加洗放大，又把父亲舞剑肖像索去，一并摆在橱窗里，以致每天围观者不绝。著名武术家金警钟先生在《国术名人录》中写道：“著者（即金本人）曾于河北公园门前照像肆，购得韩师舞剑肖像摄影一帧，迄今视为珍宝。”

令人感兴趣的是鼎鼎大名的康有为先生和康小八两人于1918年10月3日著文天津《益世报》，对康泰尔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并在报上写明不受稿酬。现将原文引录如下：



## 康有为康小八合致康泰尔书

### 压 尘

昔人云识时务方为俊杰，能量力斯称君子。今汝假力士之名出言狂放，挟缚鸡之技自号千斤，有眼无珠藐视中华，思之令人痛恨。汝个人之名誉固不足惜，所可痛者我康门中因此坍台耳。查我康门非文即武，文有圣人之称，武有壮士之誉，文则满腹经纶，保皇室无二心；武则浑身铁骨，入刑场不变色。不意汝甫经摧挫遽尔潜逃，我康门一姓从兹扫地矣。西厢句有银样蜡枪头者殆汝之谓欤。爰于某日已摈汝于族外，我大好中原从兹无小子啖饭地矣。小子有志即应远涉重洋，吾辈则当引郑庄之誓曰：“不及黄泉毋相见也”。

（不受酬）

父亲在万国赛武大会间击败康泰尔，是我国武林史上的一件大事。后来，为了纪念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为中国雪耻的日子，天津名士郭登瀚于1920年10月，用一块黄绫绸缎撰文记录父亲赴京打擂的全部经过，并精心制作极其精美的纪念插屏一帧，把撰文和大金牌镶嵌在插屏之内。撰文为楷书，内容如下：

康泰尔者，俄国之大力士也。力能屈钢轨断铁链。据报云：力胜一万四千磅，遍历欧美比武、角力无出其右者。戊午夏来我国，售技于津沪间，每一献技，观者惊绝。是年秋开万国赛武大会于北京中央公园，函约各国武士，并备小金牌十，大金牌一，以奖最后之胜利者。津门武士会武师之汇归也，得信后正复迟于力畴抵御，韩先生慕侠独毅然愿往。八月初九日晋京赴会，当被警厅劝阻，恐伤人命致起外交。先生抚然叹曰：“生死何足惜，倘不一角，致康君携奖而

归，直视我国为无物矣。”乃径谒康君于六国饭店。通刺后，略谈我国武术之精妙，康君谄谀然有轻色，遂各交臂作势。迄未支撑格拒，而康君已仆矣。康君达人故未再角，奖章全数让与先生。先生受而献于天津武士会，作为永久纪念，可见先生之事，非为一己荣耀之争，实为天津武士会名誉之争，意即为我中华民国国粹之争也。戊午年冬十月，天津武士会以大奖章归先生旌有功也。

### 庚申冬十月天津郭登瀚拜记 □

父亲击败康泰尔所获之大金牌和那块“武师”玉牌，在1986年全国挖掘传统武术成果展览会上的吉林馆内，先后在承德避暑山庄、北京故宫两次展出，参观者甚众，博得中外人士高度赞扬，有的还拍照留念。

父亲击败康泰尔，名声大振，被人们誉为“北方大侠”关内、关外的武术组织及武术界人士均欲邀请父亲表演绝技并目睹“北方大侠”之风采。当有吉林省民间武术组织通过父亲的弟子于文治（吉林省榆树县黑林子人）请到父亲及数弟子莅吉，下榻临江门旅社。次日在吉市后鱼行运动场进行了表演。

应吉林武术组织及各界知名人士之请，父亲同意在吉林省开办吉林武术馆，义务授徒，并任名誉馆长，父亲得意弟子于文治，车振武任拳术教师，兼吉林一中、毓文中学和模范小学武术教员。吉林武术馆大匾一挂出，不想竟有百余人前来报名。建馆的第一天，召开了“吉林武术馆成立大会”师生和当地各界人士合影留念。84年，尚健在的吉林省桦甸市退休教师刘崇坤亲口向我介绍当年情况说：“韩师慕侠威望甚高，名气极大，来吉表演，艺惊全场，轰动了江城。”他

又说“我当时正在学校读书，热爱国术，便拜于文治为师习武。”

吉林武术馆的建立，使韩氏形意拳、八卦掌在吉林得到了传播。

父亲和南开、女师的学生弟子结下了很深的情谊。周恩来、刘清扬等学生的爱国思想和行动，确实给父亲以巨大的教育和鼓舞。1919年，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天津学界立即声援支持，爱国学生举行罢课，走上街头示威游行，集会讲演，高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拒绝巴黎和约签字！”等口号。当时天津支持北京“五四”运动的学生主要有两支力量。一支是以周恩来、马骏等为代表的南开爱国学生，他们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一支是以刘清扬、郭隆真、邓文淑（颖超）等为首的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爱国学生，她们成立了“女界爱国同志会”，刘清扬被选为会长。

天津学生为了把支持北京“五四”运动的斗争引向深入，他（她）们决定在天津河北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发动社会各界支持爱国学生的斗争。在“国民大会”召开的头天晚上，刘清扬来到武术专馆对父亲说：“老师，明天我们在河北公园开国民大会，您德高望重，请您参加大会，支持我们！”父亲听后高兴得说：“你们学生了不起，干大事了！咱这武术馆的弟子不少是南开的和女师的，支持你们义不容辞，明天我一定携同众弟子到会助威！”第二天一早，父亲率领弟子们来到河北公园，公园大门上悬着巨幅横额，上书“国民大会”四字。进了公园，中心一个亭子上贴着一幅对联。上联是：“振民气合民心万众一心”；下联

是：“御国敌除国贼匹夫有责”。看了这幅对联，使人热血沸腾，斗志倍增。下午一时，公园聚集了几万人，国民大会开始。首先，南开学生马骏上台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话毕，群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不断高呼“还我山东！”“共救国难！”等口号。接着刘清扬昂首阔步走上讲台，以洪亮的声音代表女界爱国学生讲演，她说：“本日开会，最关紧要者，有两个目的，一为要求商会罢市，电请政府严办卖国贼，以平民愤；一为保护各省爱国学生，不得加以逼害。倘政府无正当办法，誓死不能开市、上课……”她的讲演，不时被掌声和口号打断。随后，天津商会在爱国学生的感召和敦促下，正式宣布了罢市。父亲通过参加学生的爱国斗争活动，也深受感动，深受教育，并对学生的爱国精神深表钦佩。

随着斗争的深入，周恩来、马骏和刘清扬等学生领袖认识到，要发动群众，开展更大规模的斗争，必须有舆论工具，需要办报纸。他们为了筹款办报，经商量决定再一次在河北公园搞义演募捐。父亲知道后，高兴地对刘清扬、周恩来说：“你们学生编剧搞义演，我可以从中协助，带弟子练武搞义演。”当周恩来、刘清扬感谢父亲对他们的支持时，父亲却诚恳地说：“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国家的希望，你们干的是真正的大事业，我作为一介武夫，尽绵薄之力，责无旁贷。”父亲还请张占魁、李存义两位老武师一起参加义演。义演那天，先由刘清扬讲演，接着父亲第一个出来表演，他表演了韩氏八卦掌、八卦刀和形意锁口枪。张占魁已年过半百，走了一趟北派八卦掌。李存义年过花甲，但宝刀不老，仍精神抖擞地表演了单刀和五行连环拳。接着弟子们纷

纷上场，刘清扬表演了八卦剑，女师弟子“二乔”姐妹也作了精彩表演。最后，由父亲与弟子们集体表演了最最精彩的“打瞎蒙。”这是父亲练了多年的拿手好戏。首先由父亲上台，他拿出一条毛巾，请台下观众结结实实地把他眼睛蒙好，接着说声“开打”，六个弟子同时跃上了台，个个象猛虎下山般围着父亲厮打，父亲左蹿右跳，前拳后脚，他不但好象没蒙眼睛，而且象前后左右都长着眼睛一样，想打哪个谁也响不了，不一会功夫，台上已烟尘四起，台下人也看得直了眼，直到六个人纷纷被打倒在地，父亲才停下了手。经过三天的演武和演剧募捐，果然有了一笔可观的收入，于七月下旬，《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正式出刊了。

在抵制日货的斗争中，不断发生日本浪人与奸商勾结，殴打爱国学生的事件。当局不但不制止，反而逮捕爱国学生。反动当局这种倒行逆施激起了天津爱国学生的强烈反对。天津所有学校学生到南开广场集合，然后游行示威，由周恩来任总指挥，到省公署请愿。父亲派所有弟子随学生游行，以保护学生。学生游行队伍潮水般地向省公署涌去，然而，省公署大门紧闭，迟迟无人敢出来。在同学们的强烈要求下，才不得不出来一位官员讲话，并要游行学生派代表会谈。当时学生们一致推选周恩来、郭隆真、张若名、于兰渚四人为代表，但是四位代表进去后再也没出来。同学们知道受骗上当，义愤填膺，砸了公署的大门。反动当局出动军警对爱国学生实行野蛮的镇压。

为了营救学生代表，刘清扬决定南下各省，号召全国各界联合会声援，迫使当局放人。为了刘清扬的安全，父亲亲送她乘上南下的列车。随后，父亲前往省公署，面见省长曹

锐，要求当局尽快释放被捕学生。曹锐假惺惺地说：“慕侠老师乃闻名爱国之士，今亲来公署说情，岂有不考虑之理。只是这些学生烧商店，砸公署大门，并殴打军警，不仅是闹学潮，而且触犯了刑法，故我暂时不好放人啊。”父亲针锋相对地说：“大人身为一省之长，此事定要慎重才好。学生抵制日货是爱国之举，焚毁商店乃因奸商勾引日本浪人殴打学生所致。学生到省公署请愿乃宪法允许，你们先抓了不少人不曾释放，这回又扣押谈判代表，岂不让人耻笑。省长大人比我更清楚，如今闹学潮已是大势所趋，愈抓愈厉害，愈抓愈激起民愤，遭各界唾骂，望省长大人三思而后行。”对父亲这番有理有据的讲话，曹省长无言以对。刘清扬乘车南下，先后到南京、上海、广州等地发起全国各界联合会声援。半年之后，迫于舆论压力，当局不得不释放全部学生代表。

通过这场斗争，周恩来、刘清扬等决定赴法勤工俭学，进一步寻求拯救中国的道路。父亲对此非常赞成和支持，在周恩来赴法前夕，父亲率众弟子在武术专馆前与之合影，留下了永久的纪念。

#### 四、暮年时期的韩慕侠

“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以后，父亲的南开、女师的弟子相继走上了革命道路。武术专馆的空气也逐渐沉闷起来。我们家的生活也一天难于一天。在父亲四十五岁，侠姐七岁的那年，母亲张秀如生下了我。由于我家几代单传，父亲又是中年以后得子，当然全家非常高兴，给我取名少侠。这时，由于生活紧迫，家中不得不辞退厨师、佣人。母亲生我以后没满月就操劳家务，事必躬亲，还要为练功弟子们做饭，不

幸得了月子病。父亲千方百计请医诊治未见好转，母亲终于瘫痪在床。父亲给我雇请了一位奶母，我从小就是吃高妈妈的奶水长大的。后来父亲连武术专馆的房租费用都难以支付，不得不于1922年将武术专馆关闭。父亲望着自己惨淡经营八年之久的武术专馆，非但没改办成武备学堂，反而连武术专馆也无法生存，家事、国事的不顺使父亲十分伤心。在悲愤中，将全家迁到南关下头鸿源里，在那里依然是以武为乐，课子、授徒。

为了给我母亲医治瘫痪疾病，父亲不惜重金请医寻药，求神问卜。天津南郊峰山庙（群众习惯地叫风窝庙），大殿三层，建筑宏伟，红砖碧瓦，画栋雕梁。每年四月二十八药王诞辰开庙门。这天，天津南郊的大路上行人车马络绎不绝，有些善男信女身穿素服，裸腿赤足，手举清香，头顶烈日，在30多度的高温下，从城内走来，三步一拜五步一叩到庙烧香祈祷，拜佛求药。这年我四岁，父亲也带我去风窝庙烧香拜佛为母亲祛病消灾。事毕后，庙内主持僧悟开请父亲到禅堂用茶，言明要收我为徒，让我从一长凳上爬过，他一边拍掌一边大喊：“快跑、快跑，白头到老”，说这是“跳墙还俗”今后可以大富大贵。在悟开和尚一番恭维之后，临行时，父亲向庙内布施了二十块大洋。

父亲的换贴九弟叫何竹青，是茶庄的大老板。和我们同住鸿源里，何家喜唱京戏，全家人经常在家化装彩唱，有时父亲领我姐弟二人到何家串门听戏，父亲有时高兴也要清唱一段薛礼叹月，“在月下惊碎了英雄虎胆……”。大家听了都说“真有黄派黄月山的味道。”何竹青的夫人何九奶奶对父亲说：小孩认个干娘好养活。父亲就让我认何九奶奶为干

娘。我影绰的记得，认亲的那天，何家宾客满堂，摆酒庆祝，干娘送我一个银手镯和长命锁，还用黄色绸布做了一条开裆裤，让我从裆中钻过去，以后又用它做成夹袍给我穿在身上。据说可以长命百岁。

父亲好读书，可谓博学多才，他读经史、阅兵书、习周易，吹拉弹唱无所不会，琴棋书画无所不能，衣卜星相无所不通。张学良少帅及其弟学思、学铭与父亲素有交往。张学铭出于敬慕父亲爱国之志，坦荡之胸怀，他见父亲喜欢书法绘画，于是便赠与父亲一套文房四宝，其中“老胡开文”精制的高达尺许八仙墨人和一方紫砚最为名贵，紫砚的檀木盒上嵌着一块白玉，上刻一棵苍松，旁边刻有“敬赠韩慕侠老师”的字款，并刻诗两句：“偶然貌得真松树，试问真松复貌谁？”据我理解诗的本意是：有幸结识一位英雄，这位英雄又象谁呢？——岳飞。

父亲的“强国必先强兵，用国术练兵”的思想尽管他终身孜孜不倦，百折不回地追求，但在黑暗腐败的旧中国，是无法实现得了的。在父亲近五十岁的时候，使他精神振奋的事情出现了！在张学良将军的支持下，父亲“尚武救国”的抱负得到了部份的实现。一天，张少帅在天津拜访正赋闲在家的父亲。张学良劝父亲出来做点事，打算请父亲从戎东北军，用武术训练军队。父亲觉得自己创办武备学堂的宏愿不能实现，能直接用形意拳术训练军队，既是一次尝试，对自己也是个安慰，于是父亲答应了。张学良令十六军军长拨一千名士兵，组成武术团交父亲训练，并任命父亲为武术团团团长。团部就设在南关下头鸿源里一号我们家中。武术团的集训地点在津西几十里之外的杨柳青镇。



父亲在训练武术团时，为区别其他部队士兵，他让每人都佩戴“武术团”的袖标。父亲在训练士兵时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他用早已编好的简易形意枪法训练士兵，即把形意的五行连环枪的枪法简化后的动作用来训练刺杀，也就是把劈、崩、钻、炮、横五枪，变化为步枪的刺、拨、挑、崩、劈五个刺杀动作，简单易学，有很高的实战价值。随后，父亲又训练集体冲锋格斗，整个练兵场杀声震天，连续不绝。

在训练中，父亲不但重视军事训练，还注重思想教育，给官兵讲近代史，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还把“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长坂坡前逞英雄……”这首当时脍炙人口的老歌填入新词，以激励全团官兵。

父亲买了一辆三轮带斗摩托车供去杨柳青训练士兵时早出晚归乘坐。父亲也常常带着五岁的我到杨柳青去看士兵训练。父亲为我做了一套灰色军服和一把木枪，穿戴起来也很神气，使我非常高兴。当团部官兵在我家院心中开饭的时候，我就从室内饭桌上跳下来，到士兵当中，端起大碗去吃糙米饭、白菜汤。士兵们也都非常喜欢我。

父亲在杨柳青训练武术团近两年，目的主要是针对日本的威胁。为了破日军的拼刺，后来父亲决定把武术团编成几支“大刀队”。所谓大刀，就是二尺来长的把和不轻不重的刀片，又称为“双手带”，用八卦刀中的“缠头裹脑”等动作要领，施行顺步砍、拗步砍、左右砍、连剁带劈。父亲早在清末就用“僧王刀”做过实战体验，动作虽简单，却使敌防不胜防，即使不人头落地，也会使敌人臂断枪落失去战斗力。

就在父亲全力训练大刀队时，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出现

了。由于军饷层层克扣，大刀队领不到军饷，士兵们就以停止训练表示向上司抗议。父亲赶忙请示上级，上级却互相推诿。父亲一气之下，回家要把仅有的近百块银元拿出来做军饷发给士兵。此时，母亲已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时产后月子病是很难医治的。母亲自知时日无多，二话不说把全部银元连同几件手饰交给了父亲。父亲这点钱，每个士兵只分得十几个铜板。后来在武术团的大刀队里便传出了这样一首歌谣：

武术团  
真敢干  
十二个铜板上前线  
不发机关枪  
专耍大刀片……

大刀队  
真英雄  
十二个铜板打冲锋  
吓破鬼子胆  
跪地叫祖宗……

不久，母亲便去世了，悲痛欲绝的父亲为母亲举行隆重葬礼。办完丧事后，父亲又匆匆回到杨柳青，岂料仍领不到军饷的士兵又拒绝训练。父亲彻底失望了，他要训练中国“岳家军”的宿愿又变成了一场空梦。于是父亲便愤然辞职，回到家中，和我们姐弟二人相依为命了。

后来，父亲打听到，他所训练的大刀队在东北军易帜后，被编入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民国二十年，日军发动猖狂进攻。驻守在长城一带的二十九军将士同仇敌忾，英勇抵

抗。大刀队在喜峰口换防之际，突遭万余日军进攻，双方激战，伤亡惨重。因喜峰口是战略要地，日军又以三万兵力抢占喜峰口。我方刘汝明、冯自安、张自忠、赵登禹等部，决定将各部武术团临时组成大刀队，出其不意冲入日军阵地，将山头日军全部砍死。次日，日军又疯狂全线进攻喜峰口、古北口。大刀队则埋伏在峰峦隐蔽处，待日军一到，便蜂拥而出，奋勇拚杀，给日军以重创。紧接着，大刀队又袭击了日军炮兵阵地，毁大炮、烧辎重。大刀队勇士虽多壮烈牺牲，但却使疯狂的日军受到沉重的打击。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真是悲喜交加。悲的是自己精心培育的大刀队多数壮烈殉国了，喜的是大刀队在抗日中终于显示了威力，给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以致命的打击。

“七、七”事变后，天津人民生活在日伪铁蹄之下，饱尝亡国奴之苦。日本占领军对长城战役中我军大刀队大砍鬼子头的壮烈场面记忆犹新，对中国大刀队十分惧怕，万分仇恨。因此，日本军、警、宪、特到处寻觅训练大刀队的武师。在大小武馆的武师、武士中查找，有的要给以报复，有的要诱其为日军效劳。一时间，大小武馆纷纷关闭，再也看不到公园、河边“闻鸡起舞”之人了。父亲是天津武林名人，当然是鬼子们查找的主要目标。为了避免麻烦，只好先后迁居到英、日、法各租界内居住，也在裕元纱厂工人住宅内躲避过，前后迁居达十一次之多。最后，又搬回原住地鸿源里北边一个大杂院的贫民窟里。

说实在的，父亲凭着一身绝技，晚年完全是可以把生活过得好一些的。可是，他始终保持着一个武术家应有的尊严和品格。他一不卖武鬻艺，二不从政为奴（给反动当局），

三不取不义之财。他不怕锅冷炊断，甘愿过捉襟见肘的**清贫**生活。这也同他天生一个刚直不阿，爱憎分明，不攀权贵，不平则鸣的性格有关。他曾在自己的一张“仗剑独立”式的大照片上亲笔录写了五言诗两首借以铭志。一首：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朝把赠君，谁有不平事。另首：我有一把剑，深藏无人见。今日试霜锋，鬼哭天色变。

是啊！父亲的正义之剑，直指奸贪误国、豪暴虐民的达官贵人。他一生中过问过不少人间不平之事，与权贵、日伪作过不懈斗争。

一、不平则鸣。一次，父亲访友归来，经过菜市，看见一个卖鸭的摊前围满了人。便好奇地挤进去看个究竟。原来是一个老两口经营的卖鸭摊，一富人经常光顾却老欠帐不还，这次买鸭他又要欠帐。老两口苦苦地说：“您以前欠帐尚未还清，这次又要欠，我们小本买卖承受不起。”谁知那富人反咬一口说：“什么，怕我还不起，你不让欠我偏要欠。”说完扯起一只肥鸭就要走，老两口紧拽着不放，这样一拉一拽，活鸭变成了死鸭。富人一看鸭已死，扭身要走，老两口当然不放，要他赔鸭，双方越争越烈，富人就要动武。父亲上前劝阻，对富人说：“老两口不容易”，劝富人还清欠帐，赔偿死鸭了事。那富人不但不听，还骂父亲多管闲事。父亲见他如此蛮不讲理，也不答话，上前轻轻一托富人的下颌，那人痛得哎哟叫了一声，叫骂的大咀却无法合上，下巴掉了。后来，那富人的家属出面求情，并向老两口赔了鸭，还了帐，道了歉，父亲才轻轻把那人的下颌一托，咀就复了原位。象这样好打不平之事，父亲一生做了不知多少。

二、不为利诱。父亲身怀绝技，名满津京，不少达官贵人曾以重金聘请他们为他们出力，充当他们的鹰犬，但均遭父亲的坚决拒绝。反映出“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的人格力量。我们从父亲的书稿中发现了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说：“前清宣统三年，湖南巡抚杨文鼎曾招聚中国武术专家百数十人考第优劣，侠适逢其会，忝膺首选，侠之同术人数人亦列前茅……杨抚欲聘余为侦探队长，然侠志不在此，尤不愿为虎作倀，罗织革命党人，决意辞却，北返津沽。”

三、不攀权贵。还是父亲在天津开设武术专馆的时候，天津不少名流贤达都慕名拜访过父亲。当时袁世凯大总统的长子袁克定曾拜父亲为师学武。袁克定初来之时，好不威风，武术专馆前站着两排警察，外面的马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一次，父亲不客气地对袁克定说：“只要你一来，这一带的百姓就不方便了”。袁克定只好把警察撤走了。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一天，袁克定对父亲说：“大爷（指袁世凯）想见见您。”我父亲听说总统要接见，岂能不去，于是随车前去北平。袁世凯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父亲，并说父亲办武术专馆屈才了，如果愿意，就到他的御林军或者讲武堂当教习。父亲一听，立即明白了袁世凯的真正用意，这御林军和讲武堂是袁世凯恢复帝制的御用工具，遭到全国上下的反对。但父亲亦清楚，若不答应此事，肯定招来麻烦；答应既毁了自己的名声亦毁了自己的事业。父亲经过思考，将计就计地对袁世凯说：“侠本武夫，发扬国术，特别是推广形意拳术，乃侠终身所愿。今民国已立，国民多羸弱，军队亦不振，总统大人何不拨款，建立一处武备学校，普及国术，强国强种，侠甘尽绵薄之力……”袁世凯一听，很不高兴，淡

淡说道：“建什么武备学校，这御林军和讲武堂不是现成的学校！”袁世凯停了一会儿又说：“你实在不愿教武术，你留下，我给你安排个职位。”父亲见袁世凯执意挽留，便只好说道：“总统大人，侠不求荣禄，不求仕途，更不愿从伍，只想普及国术于民众，望大人见谅。”袁世凯看实在挽留不住，只好作罢。但袁克定还不甘心，留下父亲又劝道：“大爷实在是器重你，他的意思是让你先在府里教武术，然后打算给你个直隶总督（即河北省省长）……”父亲已看透了袁家父子的用心，便断然说道：“我韩慕侠从武不从政，我还是为大众办我的武术馆去！”

四、痛斥马良。山东济南镇守史马良，是一个好武不练功的“嘴把式”，却以武术家自居，他是一个曾经镇压爱国青年的反动军阀，却跑来天津提倡新武术，骗取荣誉。也却有人为其抬轿子、吹喇叭，极尽吹捧之能事。父亲想找马良当面请教予以驳斥，马良闭门不出，不敢接见。父亲灵机一动，利用舆论工具，与之论武。父亲写了《武术乎，舞术也》一文，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文中写道：“……武者，以强身御敌之用，讲实战，不图姿美，不要花架。且看各团体所练之新武术，抛弃传统，舍其精华，以舞代武，实为武界之灾难矣。……敢问马君，习武多久，师承何门……”

《武术乎，舞术也》一文在《益世报》发表后，又有《大公报》相继发表。此后，父亲连续在报上发表文章近一个月，驳斥马良提倡的“新武术”。马良暗生气，却未敢在报上回敬一篇。与马良论武之举，表现了父亲对假恶丑的彻底揭露和鞭挞。

五、断臂拒敌。父亲晚年，一个亲日派军阀在日人指使下，来见一贫如洗的父亲，要以每月二百元聘父亲出来做事，充当他的保镖。父亲答道：“韩慕侠脾气不好，生来不会也不愿侍候人。要当保镖，头二十年前早就为袁世凯当了。”但他们仍不放过父亲，又以天津警团教练所的名义请父亲出来。父亲愤然拒绝道：“我已年过花甲，才疏力薄，不能胜任，另请高明吧。”日伪头目仍不罢休，三天两头来劝说，我父亲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于是便故意把自己左手的手腕骨折断，又故意把断骨接歪。警团教练所的人看见父亲确实骨折了，于是命令我代父去所传艺了事，当时我只有十六岁。父亲的左手看起来残废了，其实和好手一样，照样可以练武和授徒。父亲为了给自己断臂拒敌留念，特意拍了一帧露出断手练剑的照片，留给后人，使人永志不忘。

父亲到晚年，生活几乎陷入了绝境，只能靠当卖拆押度日。最后连唯一的一张床都卖掉了，以致不得不把黎元洪题字的“武术专馆”横匾当作床用。为了生计，父亲在路边摆起了摊床，靠卖烟糖水果糊口，但他仍免费传艺授徒；有时，为左邻右舍劳苦群众诊病、施药，解除人们身上的痛苦。他还为人们占卜、看相、消除他们思想上的疑虑和苦恼，并以此自慰。

一九四七年十月，父亲被一场重病夺去了生命。终年七十岁。

一九八四年七月，父亲的弟子、西安市武术协会主席、九十一岁的郭叔蕃老人向采访他的记者介绍了我父亲的生平事迹后对记者说：“慕侠老师在万国赛武大会上威服‘震环球’的康泰尔，在我国武林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韩师一

生光明磊落，铁骨铮铮，真是一位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当代武林奇杰也！”此语真实地概括了父亲的一生，仅借来做为我这篇回忆文章的结语。

后记：

本文作者韩少侠，又名韩琦。一九二二年出生于天津市，毕业于天津西开中学，系韩慕侠先生的独生子。他九岁起随父习武，十六岁开始代父传艺六年，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技工队长、排长、军事教员等职。一九四九年参加了开国大典，目睹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在天安门上空。一九五一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曾受通令嘉奖。回国后于一九五四年集体转业，来到磐石县供销合作社工作，直到一九八三年离休。

韩少侠在父亲晚年“有志难酬”的悲观情绪影响下，三十余年不提父辈之事，从不言武。直到电视剧《十一枚金牌》和电影《武林志》上映后才透出消息——他就是《武林志》中的主人公东方旭的原型人物韩慕侠之子。一时县内外哗然，消息不胫而走，愿拜师学艺者甚多，香港亦有武林同道来函求教。在党组织的关怀下，在武术界期望和父亲遗志地激励下，沉默了三十余年的韩少侠开始义务收徒传艺。现有男、女弟子数十人。

韩老性情爽直，为人坦诚，做事认真，他全面继承了父亲武术绝技中之精髓，不仅精通韩氏形意、八卦之拳法，也继承了“因人而异，灵活多变，传艺亦传武德”等教学方法。一九八五年在全国挖掘传统武术工作中，参加了吉林省



老拳师的表演和录相。他著有“发展武术、勿忘传统”的论文，曾在一九八七年全国武术研讨会宣读发表。一九八六年被推举任磐石县第一届武术协会主席。他甘愿奉献晚年余热，为把韩氏形意、八卦绝技真传继承下来，为发展祖国的传统武术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 忆五三年大水与复兴村救灾

孔宪禄

谨以此文纪念我的老领导、老同志窦增鲁（1953年磐石县委书记，1963年逝世）、刘景贤（1953年磐石县长，1992年逝世）和蒋成智（1953年磐石县委秘书，1987年逝世）。

1953年8月18日晚下了一宿大雨，雨量达110多毫米。8月19日早晨，境内各河开始涨水。一上班县政府的全体同志就立即奔赴南头粮库去抢险。当时粮库大院的北边是土产仓库，水已没膝盖深，大家抢着从仓库中向路西高地转移物资。忽然，县府通信员气喘吁吁地跑来通知我说：“刘县长让你（我当时任县府农业科副科长）马上到南大桥去，有要事。”我立即急奔南大桥（就是现在的磐石大街的磐石大桥）。当我赶到时，刘县长已在桥的南头等我。他告诉我说：“黑石涨大水，复兴屯被水围困，我们必须马上赶去组织防汛。细林的兰家网也开始涨水，窦书记和老蒋上细林。”话刚说完，窦书记坐着马车（当时无汽车，县委、县政府各有胶轮车一台马数匹以供运输、下乡急用），蒋成智同志骑着一匹马，又练着一匹马（都是县政府马号的马）一起来到。接着窦书记和刘县长坐马车，我和老蒋骑马，急奔细林。走到太和，又下起雨来。中午到细林区政府，雨越下越大了。在细林我们和黑石、兰家联系，得知黑石的富太河桥

已被大水抬走，黑石大江的渡船缆绳已冲断，黑石腰街西头已经进水，细林兰家网段的江水已经出槽。我们在细林区政府匆匆吃了午饭，把车和马留在细林，就冒着瓢泼大雨赶路了。

窦书记和老蒋上兰家网。事后蒋成智同志告诉我：他们冒雨赶到兰家网已将近半夜，大江出槽，水已到屯南。窦书记连夜召开会议，通过研究决定：天亮后一部分人在屯南低处筑坝，先挡住水，争取时间；其余的人集中全力搬家。窦书记虽然身体不好（有气管喘息病）又一宿没合眼，但仍精神百倍地参加并指挥大家抬土垒堤。十点钟左右水势猛涨，有一处突然决口，大水穿箭似地涌出，窦书记和附近的几个民兵一下子被水冲倒。当大家把他们从激流中救出后，窦书记二话没说又扛起一草包土直奔决口而去。同志们劝他休息一会儿，他坚决不肯。在窦书记的鼓舞带动下，大家个个奋勇争先，决口很快堵住了，时间争取到了。到午后三点钟，屯里各家已经搬完，所有的人都已安全转移。兰家网的防汛抢险斗争取得了胜利。

我和刘县长奔黑石。因为富太河桥已断，我们只能到茶尖岭，然后奔小茶尖岭、马鞍山到鲶鱼汀，从鲶鱼汀过江到复兴去。当我们从细林区政府出来，细林屯东门外的公路已被水淹没，新益屯南，公路上的水已没腰深。我们只好看着路两边的树，坚持在路中间趟水走，以防掉到路边的深沟里去。雨大，又是趟水，走得很慢，晚八点才到茶尖岭。到茶尖岭后由村政府派一民兵拿着马灯给我们带路继续前进。我和刘县长每人卖一斤饼干，一边走一边吃，天上下着大雨，手里捧着饼干，就象吃粥一样“提里突噜”地喝。因为紧

急，尽抄近道走。从茶尖岭到马鞍山全是山间小道，两边的树棵子又高又深，顶着雨、摸着黑，爬山越岭，到半夜一点钟到了鲇鱼汀。这时雨也住了。我们到屯长老于头家。这个老于头是山东人，有50多岁，大个，长挂脸，连鬓胡子，是个老贫农，只跑腿一个人，在他女儿家住。到屋后我们把外面衣服脱下拧了拧又穿上了。老于头去把村长苗振忠（复兴村的村长，在这个屯住）找来了。苗村长说：“你们来得太好了，不然亮天我也要赶到复兴屯去。”吃饭时大家互相提醒：“尽量多吃点，下顿饭不知什么时候吃呢！”现在我还记得当时吃的是小米干饭，炖豆角，煮的咸鸡鸭蛋。饭后天快亮了，苗村长和老于头张罗找船。他们去了大约十多分钟回来说：“船是找不着了，会摆船的人都说，你们不怕死，我们还怕担责任呢！这水这么大，若顺了大“流”还想活吗？”我们又进一步研究，最后的办法是借一条船，由苗村长掌舵，老于头划船，我们四个人乘坐一条小船片过大江到复兴屯去。早五点钟开船。开船前老于头说：“我是跑腿一个人，已经五十多岁了，就是出了事也没有什么牵挂，只是你们几位……。”刘县长听了后说：“你、苗村长、孔科长和我都是革命干部，群众有难，我们应该去帮助，危险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你就大胆地开船吧！”苗村长说：“刘县长、孔科长你们二位坐在船上只管低着头就行，什么也不要管，不论船怎么摇晃只当没事一样，摆船的事我们俩负责”。我们从鲇鱼屯大南边开船，放眼望去，一片汪洋，到处是水。船在摇晃中艰难地时进时退，船上的四个人几乎是屏住呼吸，只听见大水震耳的哗哗响声，每个人浑身都浸透了汗。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只听苗村长大声喊着说：“大

流片过来了，已经片出三里多地了”。我们这才略感到轻松。抬头一看，船已开到姚家屯北的大片农田里，矮庄稼已经被淹没，包米也只有蓼露在水面上。我们从农田里一直开船到复兴。到复兴屯已经是8月20日的中午了。

在复兴屯下船时，水已没到膝盖。屯的南趟街正在搬家。当时的黑石区委书记王跃林和一些区、村、屯干部正在组织群众搬家。后趟街的群众因为还没上水，仍在观望，对于搬家仍然下不了决心。刘县长听了区里的简要汇报，查看了水势，访问了群众，分析了形势，当即果断地决定：不论前后趟街，一律搬家，天黑前一定搬完。并立即在供销社召开了有各级干部、党员参加的紧急会议。刘县长讲了话。这个讲话我已忘记，但当我翻阅当年的笔记本时却意外地找到了。事情已过去四十多年，为了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和留存一点历史资料，我把这篇讲话（摘记），原原本本地抄在下面。

#### 刘县长讲话（摘记）

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为了防汛救灾。因为我们是人民的政府，就要帮助人民群众抗灾。伪满这里也涨过水，但警察先把自己的老婆载走了。现在的水情是：

1、柳河县城已被水淹。水情和1951年差不多。今天中午柳河水已到朝阳镇，估计这个水头在今天半夜就能到我们这里。

2、刚才区里来信，柳河、朝阳镇的水势继续上涨。

3、现在我们这里每小时涨水半尺，正处在紧张阶段。

4、再呆八小时（涨四尺），到今天半夜就要淹没屯子。

5、除了柳河、朝阳镇还有交河、亮子河、档石河、细林河、都力河等等十余个水头，都象墙似的袭来，我们的屯子就要来到更多的水。（原记如此）

6、究竟水涨到什么程度，现在还很难知道。但要明确这不是忙牛水，而是大江水，涨势猛，消得也慢。

究竟怎么办？

1、要马上搬家。抗水灾的办法不是别坝，就只有搬家这一办法。当然搬家也不是容易的事。我们是不愿意搬家的，但洪水逼着我们搬。必须把“破东烂西”、“零三码四”收拾好，有准备、有秩序搬家。如果等到水来了再搬，孩子哭、老婆叫，东一把、西一把，乱抓起来，损失就更大了。

2、民兵要站岗放哨，观察掌握水情，要提高警惕，做好保卫工作。

3、村成立防汛指挥所。

4、要互相帮助。对军烈属，对无车马户要采取互助的办法，互相帮助。

5、悲观是不对的。因为我们是中国人。1951年受灾后我们不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战胜了灾害、重建了家园吗！应该明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何况政府还在积极领导我们抗灾自救、各地人民都在积极支援我们呢！

6、有的人认为暂时不要紧，水涨到一丈才能淹着。必须看到现在水一个劲儿地往上涨。我们必须做到水不来先搬家。等水来了，那就什么都晚了。

7、研究落实以下各项：①马上收拾东西，立即搬家；②有车马户与无车马户的互助，马上落实；③对烈军属的帮

助要落实；④搬运工具要落实。水小用车，水大用船；⑤警钟为号。

刘县长的讲话扫除了一些人犹豫观望的侥幸心理，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当即研究落实。接着上下齐动，天黑前果然全部搬到屯南的山岗上（就是现在的胜利屯）。

傍晚，刘县长派区委书记王跃林等几名同志到西边的新立屯去组织群众。当时约定的信号是。如果水势危急，以放枪为号，放三枪这边就去人、船支援。他们坐船走后就再也没有消息。到半夜十点钟，刘县长与大家研究认为新立屯危险，于是把复兴屯交给村支部书记张殿才和另外几位区里的同志，我们几个人由复兴屯屯长邢殿元摆船赶到新立屯去。我们到屯后，王跃林同志激动得跳了起来，他说：“这里水涨得很猛，我们早就放了三枪告急，但没有反映。”其实因为水大，我们根本没有听见放枪。这时水已到了屯边房前，有人在此处设了水尺，观察表明水一直上涨。我们大家轮流值班，每班两人值一小时，每小时都上涨半尺多。同志们到各家去通报水情，督促群众做好各项准备。早晨四点钟，东方刚发白，东南的水已经没腰深。屯里的妇女、小孩、老年人已经出了家门站在屯南的大道上准备转移。带小孩的妇女抱着最小的孩子站在没腰深的水里，稍大一点的孩子拽着母亲的胳膊，水已没脖，险些就要“喝汤”，情况十分危急。我们当即号召所有的党团员干部帮助抱孩子、看护老人。三只船立即集中力量先运送妇女、小孩和老年人到对过的山岗上（就是现在的新胜屯）。船一趟一趟地运，到八点钟把所有的人安全地送出去了。接着运送一些必要的东西。复兴屯长邢殿元撑船运送妇女儿童时，他叔叔想把酱缸搭船

运走，邢殿元严词拒绝说：“现在是救人，谁捎东西也不行，你是我叔叔也不行。”他叔叔只好把酱缸搬下去。鲶鱼屯的屯长老于头片过大江把我们送到复兴屯，他已回不了鲶鱼汀，就在复兴屯帮助大家防汛抢险，与广大灾民同甘共苦，直到七天以后水消了，他才回家。新立屯群众搬家一直到十一点多钟。群众全部搬走了，最后屯里只剩下刘县长、区委书记王跃林和区村干部六、七个人。屯里最高处的水都没腰深。我们只好转移到地势稍高的井台上，但当大家到井台处刚站稳，就听轰隆一声井陷了。有的抱住井架子，有的人立即跑开。已经没处去了，最后只好趟水到屯北的土墙上，骑着墙等船。到中午十二点船来了，把最后剩下的七、八名县、区、村干部接走了。到新立屯南岗，看见新立屯的房子大部分只露个房盖。南岗与新立屯间一片汪洋，几乎成了大江的主流。从上游冲下来的房盖、柴禾垛就象大城市马路上的汽车，一个跟着一个，顺水往下漂流。有的房盖上还聚集着大群的鸡鸭，象箭打的一样，迅速漂流过去。

这场水真是大得很。复兴、新立屯大部分房子都冲倒了。姚家屯只差屯北一趟街没进水。复兴屯张元和家用四个石碾子坠在包米楼子的四条腿上，把粮食、衣物装在上面，以为很保险。哪知道水消后只剩下一个石碾子，整个包米楼子已不知去向。到水消后我们发现一个斗（量器，也叫半斗子）挂在复兴屯东门外大树稍的叉巴上。

在这次大水中，复兴、新立两屯的群众都搬到岗上，临时搭起杈子居住。好多家因紧急转移来不及带粮食和食盐，只好临时互相调剂。我们这些干部为了减轻群众的负担，就摆船到淹没地去掰包米、摸土豆，回来用涨上来的混水烩熟，



蘸点盐水充饥。屯干部、团员蒋绍先当年二十多岁，出去掰苞米、摸土豆、募集粮食都是他撑船，他不顾个人安危，在抢险救灾中，事事走在前头。水略消后我们摆船到北崴子去募集粮食。到屯后广大群众纷纷行动，有的扛着苞米楂子、苞米面、高粱米、小米送来。有的现套碾子、磨，碾苞米楂子、磨苞米面。广大群众视受灾的乡亲如自己的亲人，使我们深受感动。水是8月23日开始回落，8月25日以后我们的工作就开始转入领导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帮助群众重建家园阶段。当大水消退群众临时住处基本解决之后。首要的一条是防病治病，县医院和黑石卫生所都来了医疗队。在清理环境搞好卫生的前提下，首先做好如下八件事：

- |           |         |
|-----------|---------|
| 第一、淘好井；   | 第二、晒被褥； |
| 第三、洗净菜；   | 第四、灭虱子； |
| 第五、吃热饭；   | 第六、喝开水； |
| 第七、睡床铺干草； | 第八、睡热炕。 |

这场大水，至今已过去四十多年了，但每当我想到这一切、内心就十分激动。象老于头、邢殿元，还有蒋绍先、苗振忠、张殿才等这些村屯干部真是太可敬了。在危难关头，他们心里想的是广大群众，而根本没有顾个人的小家。这种精神催人奋进，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好同志，使我直到今天仍然不能忘记。

撰稿人系原县委农工部部长

## 五十年代区政府的“五·十”工作制

宋景瑞

1954年冬，我调入取柴河区人民政府任农业助理员工作。当时全区只有干部16名，负责兴隆川、二道河、取柴河、大梨河、小梨河、振兴等9个行政村的工作。

平时，除留部分同志处理区政府日常工作外，其余大多数同志都是直接下到各屯，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面对面地开展工作的。

当时，区上规定、区干部实行“五、十”制，即在下边连续工作十天、回区政府五天（汇报、整理处置分管工作和休息）。每次下乡前一天，区委书记要在下乡干部会议上根据各个农时季节的具体情况布置下乡任务，提出要求。下乡的人除了做好中心工作外，还要兼抓青年、妇女、民兵、治安、民政等区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各项工作，叫做“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就是说，下乡干部什么工作都要抓，回区汇报工作方方面面的都要谈，归谁主管谁就分别重点记、分头处理。

那时，下乡干部没有汽车、自行车也没有，靠的是背着行李、挎着背包徒步走，大有晴天一头汗、雨天一身泥的气概。我记得取柴河到振兴近40里，每走一趟就要大半天的时间，但并不觉得累，也不觉得苦，精神上非常充实。进屯

后、行李一放就立即投入工作。那时吃的是派饭、每顿交一角钱、四两粮票，住的是老乡家，大伙风趣地说这是“吃百家饭、串百家门”。可是很多情况就是在这一吃，一住中了解到的。

“五、十”工作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时的乡村干部都已形成习惯。这一工作制一直到1958年大跃进后，逐渐逐渐地消失了。

作者系原县经委党委副书记

## 对1953年推广肇源丰产经验的回顾

孔宪禄

1952年初，黑龙江省肇源县县委书记任国栋在访问丰产模范方成志（每公顷，即每垧产玉米一万五千斤）、于长江（每垧产谷子九千斤）后提出一个问题：同样的土地，为什么有的种玉米只打三千？种谷子只打一千五百斤呢？接着他深入田间，详细考察丰产田和一般地。通过反复对比，发现两者的主要区别是：丰产田苗的分布等距、合理、苗全；一般地苗的分布稀厚不均，严重地缺苗断条。于是他集中大家的智慧，提出“等距宽播，间苗保苗，分期施肥”的新耕作法。1952年在肇源全县大力推广后，到秋增产一倍。这就是六十年代推动农业大发展的肇源经验。1953年初吉林日报先后登载了黑龙江省省长于毅夫关于肇源丰产经验的调查报告和黑龙江省委书记赵德尊评价肇源经验的文章。不久吉林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全省大力推广肇源丰产经验。

肇源经验第一次给农业生产提出一个植株合理分布和单位保苗数的问题。肇源经验的核心是：在采取基本措施（施肥、良种、管理等）的前提下，实行合理密植，保证全苗。磐石自开发以来，农业生产一直是广种薄收，粗放经营。对于地里的苗怎样合理分布？每垧地保苗多少？人们很少去想，一些人是模模糊糊，一些人根本不知道。肇源经验中的

等距，主要是指玉米、高粱的植株分布要同等距离。一垧地是一万平方米，折成九万平方尺，按一尺八寸的垄距，一垧地的合计垄长就是五万尺。混种玉米，株距二尺，每垧保苗数两万五千株。清堂玉米，株距一尺五寸，垧保苗三万三千株。高粱株距一尺，垧保苗五万株。宽播就是苗眼宽些，以便于留“狗咬纹”的拐子苗，主要是指大豆、谷子（当然大豆、谷子间苗时仍有等距问题）。大豆每尺远留五棵苗，垧保苗二十五万株。谷子每尺远留苗十五棵，垧保苗七十五万株。

肇源经验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土地的巨大增产潜力。它告诉人们：玉米每垧保苗三万三千株，每株产量四两，垧产就是一万三千二百斤（当时一般垧产四千五百斤）。高粱每垧保苗五万株，每株产量二两，就是一万斤（当时一般垧产三千七百五十斤）。大豆垧保苗二十五万株，每株产量三钱，就是七千五百斤（当时一般垧产二千零五十斤）。谷子每垧保苗七十五万株，每株产量一钱，就是七千五百斤（当时一般垧产一千五百六十斤）。事实证明，这个增产潜力帐是正确的、合乎实际的，1990年我县玉米的平均垧产已经达到一万二千六百斤。

通过量弓口（五尺为一弓，当时有一种丈量工具叫“弓”，形似园规，“弓”的两腿中间称为弓口，也就是五尺）、查茬子、称穗头、算产量，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一次大解放。到玉米地里量十米远（合三十尺），查玉米茬子为八棵，按老种法（株距二尺半）应有苗十二棵，缺苗四棵，缺苗率是百分之三十三；按新耕作法（株距二尺）应有苗十五棵，比现实存苗多七棵，即可增加百分之九十的苗。通过

量、查、算，大家看到几乎所有的土地都缺苗断条，少则两成，多则三成到五成。玉米、高粱都是稀植；大豆、谷子都是稀厚不均，缺苗断条，厚的地方如“马鬃”，断条的地方根本无苗。另外，有的垄宽二尺或二尺二，比一尺八的垄，浪费有效面积百分之十到二十。这使群众认识到过去严重地浪费了地力。同时也在本县发现了不少玉米、高粱亩产万斤，大豆亩产五千斤，谷子亩产八千斤的高产地块。十二区娄家屯老王头二亩地谷子共打一千八百斤，核亩产九千斤。他说：“我活这么大岁数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打这么多粮，就认为这是‘打宝场’（一种民间传说，说是场院有神相助，粮食越打越多，超过一般），不敢说，怕说破了来年就打不这些了。这回明白了，真正的原因是多上粪再加上等距宽播，间苗保苗。”

1953年全县大力推广肇源经验，获得显著的增产效果。当年遭受严重的水灾，全县水淹绝收的面积就达一万一千多垧，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十五。当年粮豆总产量达到十三万一千多吨，比1949年增产百分之十五。屯屯都有高产典型。六区翻身村五道荒沟屯倪长发一垧玉米，产量达一万五千六百斤。十三区二道河子村小二道河子屯龚义互助组种高产田六垧七亩，其中高粱两垧，亩产八千一百斤；谷子两垧，亩产七千九百斤；玉米一垧八亩，亩产九千斤；大豆九亩，核亩产五千三百斤。六区复兴村、十二区烟筒泡村很多群众惋惜地说：“我们的大豆、谷子都间两遍留的拐子苗，长得可好了。若是不受水淹亩产都得达到六、七千斤。”

推广肇源经验，使广大群众普遍看到了保证全苗、合理密植、缩垄增行这三个方面的增产潜力。从此人人懂得合理

密植，人人会算每垧地的保苗数。“施肥是基础，良种是关键，保苗是中心”这一增产诀窍已深入人心，为人们普遍接受。以后推广玉米一垧双株、三株、单株密植和划印坑种，高粱穴播，大豆扎眼种，谷子宽播自来苗，水稻正行插秧和大垧栽培等都是肇源经验的引伸和发展。种田不断改革，带来了产量的连续增长。全县的粮豆总产量：1955年为十六万吨；1965年为十八万吨；1975年为二十四万八千吨。

作者系离休干部，原县委农工部部长

## 解放前磐石县的典当业

耿万林整理

典当业是最早出现的民间金融机构，以发放物资抵押贷款为特点。磐石县建得最早的当铺，是民国元年（1912）6月开设的永衡和当，总经理范象魁，额定与实收的资本金都是13636元（吉大洋票）。

永衡和当是吉林省的永衡官银钱号在磐石县城开办的附属业务机构，至民国6年（1917年），永衡和当升格为永衡官银钱号磐石分号，业务也由单一的典当改为经营银行的全面业务，办理存贷款、汇兑及票币兑换等，直到民国21年（1932年）被伪满中央银行吞并为止。

从民国16年（1927年）至民国20年（1931年）期间，磐石县城相继有数家当铺开业。据1933年吉林省公署总务厅调查科刊出的《吉林省各县金融机关调查书》载，磐石县的具体情况如下：

磐石县金融机关一览表

（金额单位：现大洋元）

业名及 称名	交易所 银市	永隆当	庆源当	东兴当	公顺当
开设时间		民国16年 4月22日	民国19年 4月22日	民国19年 4月22日	民国20年 7月3日
资本总数		25 000	15 000	5 000	8 000



当本总额		24 403	51 500	21 000	100
当利总额		10 853	10 650	3 717	536
常年经费	420	11 600	12 300	4 920	2 660
二十年度纯利	160	747	1 650	1 203	2 124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占领磐石之后，原有当铺多数被日本人挤垮或吞并，并新建了一些当铺。到伪满康德三年（1936年）统计，全县已有当铺11家。这些当铺的大致情况如下表：（注：十一家中，日人八家，鲜人二家，满人一家）

商号名	经营者	资本金	开设年月
荣升号	冈留政成	1 500元	康德元年三月
日升号	冈留政成	1 500元	康德元年三月
更新号	本山佑一	1 200元	大同二年八月
福利当	久留岛七郎	1 500元	康德元年八月
兴顺当	安田宪三	5 000元	康德二年十二月
泰兴当	金顺九	700元	大同二年十月
大和当	金文薰	400元	不明
协昌当	藤木亭三	5 000元	康德元年十二月
永隆当	张佩华	4 000元	康德二年四月
同合当	田中市平	1 000元	康德元年四月
庆顺当	小野寺孝彦	2 000元	康德二年八月

这些当铺的规模不大，从业人员亦较少。一般的只有 4 人组成，即经理 1 人，负责当铺的全面业务，主管收当物品鉴定，特点为能识别质物、适当评价、精于核算，又能精明处置满货；帐房先生 1 人，负责当铺的会计核算业务，如经理不在时可代收当业务；此外还有年青杂役 1 人，伙夫 1 人。

关于典当业营业及管理的条例或办法。当时全县统一制定了《磐石质屋（当铺）同业组合规定》，其中主要规定了当铺的营业时间、利息幅度、当取期限及意外灾害损失的处理等有关事宜。

具体内容如下：

就业（营业——编者注）时间：

四月一日至九月三十一日——为午前七时至午后六时；

十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自午前八时至午后五时。

利 息：五元 日息 壹分（壹钱）

五元以上日息 捌厘

十元以上月息 壹角

当 期：活当期限六十日，宽限期一个月。

当品遭灾难时的办法：遭火灾、盗灾及不可抗拒的损害，按不负债、不被盗时贷款额的一半赔偿。

上記规定系磐石当铺同业组合会议公布的。

作者系磐石县人民银行监察员，政工师。

# 解放前的磐石工业

宋景瑞整理

磐石县在解放前只有8家工厂，均属私人经营，靠雇用工人干活，手工操作，维持简单的生产。工人们付出的劳动代价相当大，可工资收入却极其微薄。当时的8家工厂，大体情况是：

一、万增源烧锅，建于1888年（光绪14年）。经理蔡凤歧，厂址在县城南卡门里路东（现木器厂一带）。雇工12名，生产散白酒。有资金16.000元（银元）。1947年5月31日磐石解放，由县政府接收为国有，改名荣城后勤部，进行三班烧酒。当时有36名工人，县政府还派人进驻管理。其收入全部支援解放战争。

二、恒兴泉烧锅，建于1898年（光绪24年）。厂址在县城五区56号，经理杨毓东。这个工厂两班倒，生产白酒和豆油。当时有工人60名、资金15000元（银元）、20间低矮的破草房。没有电器设备，生产全靠手工操作，条件很差。年产白酒200吨。1947年5月31日磐石解放，由民主联军六纵队一团接收，后移交给吉南专员公署，改名为吉林省国营烧锅。接收后留用了全部人员，生产照常进行。后经多次整顿，生产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白酒年产突破了1200吨。

三、铁农具厂，建于1944年（民国33年）。经理孙恒

久，工人20名。主要从事大车和部分农具的修理工作。当时仅有2台皮带车床，2台小台钻，1台气泵，厂房12间。解放后的1947年7月，由县政府接收，改名为胜利铁工厂，派张俭同志担任领导，原有的人员全部留用，以维修枪支为主兼修农具，对解放战争贡献很大。现在的木工机床厂就是在铁农具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四、大同洋灰股份有限公司，建于1932年（民国21年），属日伪合营。负责人林助冶（日本人），地址在七个顶子，采掘地点为城郊大椅子山、七个顶子、骆驼砬子。有资产300万元（伪币），工人150名。使用25马力动力机，架设了照明电灯。这个单位是伪实业部批准的。磐石解放后归为国有，生产的矿石供给抚顺水泥厂。

五、磐石印刷社，建于1938年（民国28年），私人经营，经理金香久（朝鲜族）。厂址在县城东门外，厂房7间，占地面积126平方米，职工14人。设备有八页印刷机2台、四页印刷机2台，手搬印片机1台。可印长宋和明宋两个字体。其经营范围是文字印刷，兼营被服和文具。1945年12月吉辽军区进入磐石，用3000元买下这个印刷社，改名为吉辽军区政治部印刷厂。1946年6月，吉辽军区转驻延吉县，政治部印刷厂被国民党接管。1947年5月31日磐石解放，将印刷厂收为国有，改组为今天的磐石县印刷厂。在公私合营时，建于1940年（民国23年），由李书润私人经营的大东书局和1945年（民国34年）由王凤亭私人经营的文阁刻字局，全部过渡为地方国营企业，拼入了磐石县印刷厂。

六、日满株式会社砖窑，建于1939年（民国28年）。窑主是日本人福寿农源。有马蹄窑五座，工人100人，年产红、

青砖150万块。1941年（康德8年），福寿农源把砖窑租给张、姜（名字不详）两人经营。磐石解放后的1947年11月，县政府接管砖窑，派人护厂，当时没有生产。1948年4月，县政府派张利一负责，恢复了4座马蹄窑的生产，年产300万块砖，现磐石县砖瓦厂就在这个厂址建起来的。

七、烟筒山煤矿，建于1918年（民国七年）。这个矿是当地农民刘新农挖白土子发现的。1921年，日本人吉田金丝鸟在这里建了私营矿，雇40人开采，年产无烟煤2000吨。1945年后，日本人逃走，当地群众自行开采，国民党政府没有管理。磐石解放后，县政府派杨恩为代表接收了煤矿，原矿长刘步赢继续留用，年产煤3000多吨。

八、烟筒山石墨矿，1917年（民国6年）被王良普发现。后于1928年（民国17年）7月，由张弼臣等5人组织微量开采，雇用工人10名，日产石墨5吨，因用途不广、销路不佳，于1930年（民国19年）停办。1932年（伪满大同元年），由大陆公司资本家恢复生产，雇工30名，采出3000吨，也因销路不好而停采。不久，由日本实业公司经理中岛，以强制手段收买，工人发展到40名。中岛用两年多的时间作了大量的采矿准备。1936年（康德3年）春季，因资金不足，又与日人夏本合资开办，改号天合公司，年产3000吨石墨。1937年（康德4年）10月，日人铃木又入股份，改名宏信公司，工人增到70名，年产石墨8000吨。1938年（康德5年）归伪满国营，改名为万友株式会社，工人达200名。日本投降的第二年6月，董敬斋招用10名工人进行手工开采，月产60吨左右。磐石解放后，董敬斋远走他乡。1948年3月由县政府接管。当年4月，省政府工矿局接收管

理，在1952年又交给了磐石。现在，石墨矿已机械化采掘，是一个年产20000多吨石墨块，并可加工石墨粉的中型企业。

作者系原县经委党委副书记

## 伪满统治时期的磐石金融业

耿万林 整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加紧筹建伪满洲中央银行和吞并旧行（号）的准备。1932年6月15日，伪满洲中央银行成立，7月1日正式开业的同时，吞并了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钱号、黑龙江省官银号。日伪政权在当年6月颁布伪《货币法》，强行统一东北币制；1933年11月，颁布伪《银行法》（私人银行法），整顿私营银行，打击民族金融，日本侵略者独霸了东北金融市场。为适应不断扩大的侵略战争，加紧“满洲产业开发”的需要，又于1936年12月颁布伪《兴业银行法》，把日本在东北的朝鲜银行支行和营业所、满洲银行、正隆银行的总、支行合并，成立了伪满洲兴业银行。为进一步掠夺农产品，日伪政权于1943年7月颁布伪《兴农金库法》，8月成立了专营农村金融的农业银行——兴农金库，并在城乡遍设金融合作组织。1945年8月，随着日本投降，傀儡政权灭亡，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金融侵略工具全部结束了它们的罪恶历史。

回顾一下日伪时期的金融业概况，对我们了解日本侵略者在东北进行金融统治实质，是大有益处的。

1932年7月1日伪满洲中央银行正式成立，伪满洲中央银行磐石县支行也于同时在吉林永衡官银钱号驻磐石分号旧

址（磐石县城东大街路南，现工商银行县支行处）开业。

当时的满洲中央银行，一切重大问题都要通过日本大藏省，它实际上是日本银行在东北的特种分支机构。因此，同其他各支行一样，满洲中央银行磐石县支行也完全是按照日本模式实行货币、信用管理的；所发行的货币币值完全为日元所左右，是日元的附庸并参与伪政权经济金融方针、政策和资源掠夺计划的实施，强行统一币制，独霸全县金融市场，以达到实行资金统制，垄断货币信用，支持侵略战争的目的。

伪满中央银行磐石县支行刚成立时有员工8人，首任经理王家驹，副经理郭增晋。1937年“七·七事变”后，支行人事大动，其上层人物有经理范蔚琛，帮经理（经理助理）徐明德，次长，日人佐藤节夫。这时银行员工数增加到14人。

伪满中央银行磐石县支行经办的主要金融业务有存款贷款，托收结算、货币发行和代理国库等几大类。业务简况，据1939年12月末统计，当年年末存款余额434161元（伪满币），年末贷款余额为613996元，12月汇兑收入额1605039元，12月支出额2310371元。

1943年7月，日伪政权颁布了《兴农金库法》。根据这一法律，是年9月伪满中央银行磐石县支行撤销，变为兴农金库磐石支店。

为加强金融掠夺和殖民统治，《兴农金库法》对城乡金融业务进行了重新划分，实行分而治之。兴农金库专管城镇业务。经过批准后除代理银行的存贷、出纳、汇兑及国库业务外，还陆续增加了发行债券和票据贴现等项新业务。而



农村金融业务则由兴农合作社管理。

兴农合作社，是以指导农事协作和提供农业生产资金往来需要的名义开办的，实质是为日伪统治服务的半官方的民间信用机构。

兴农合作社的各级管理机构大致是中央设一个中央会，各省设联合会，县、旗级设合作社，各区街设办事处，最基层村屯就直接叫兴农会。

磐石县兴农合作社，是把原先的“金融合作社”与“农事合作社”进行合并而成的，主要分管农村的贷款和储蓄业务。当时有员工20多人，地址在现今磐石县图书馆处。

其贷款业务，只有春耕贷款一种。方法是将每20人以内的社员组成一个“相互联带保证组”，根据这种保证组的联名申请，在每人贷款不超100元的范围内贷放购买农机具和役畜所需资金，采取由兴农会全员或保证组全员联带对债务负责的办法，本金与利息分三年归还。另外，对购置自耕地所需资金，是以佃户购置的土地作保给予贷款的。

兴农合作社开办的储蓄种类，有特别活期存款、定期存款、零存整取存款、定期定额存款、通知存款和活期存款六种。其利率由日息0.5厘到年息6厘不等。

作者系县人民银行监察员，政工师。

# 建国前磐石税务

夏德修 整理

磐石设县治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3年）。是年，裁撤磨盘山分州，改为磐石县，隶属于伊通州。

早在磐石县设治之前，当时磨盘山就设有牲口税局，地址在城郊磨盘山下，专收牲畜皮革税；抽捐局，地址在城内小南门里，专收铺商杂货税；斗税局，地址在城内南门外，专收粮米税；山海税局，地址在城内西门里，专收山货、皮张、海产品、土产品税；木税局，地址在城内南门外，专收木税。

1903年磐石建县后开始了赋税的征收，主要是田赋和税课两类，均以银两纳税。田赋是清初地丁银的演变，把土地和人丁应纳的税银合并按耕地亩数缴纳定额税。在完纳田赋的同时，还附征亩捐（亦称亩捐）。税课是对烟酒、山海土特产品，工商业户按规定项目从价或从量计征。田赋虽属国家税，但始终由地方官府经征。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磐石征收的税课有：烟酒税、山海税、木税、参药税、洋药土药（即鸦片）捐、厘捐、粮税、牛马税、屠宰捐、车捐、田赋、营业附加捐等十二种税课。

1908年，磐石县根据省令，撤销原有各税局，成立统税局征收各税。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被推翻。1912年，成立中

华民国。磐石县改设税捐征收局（为省二等局），下设黑石、烟筒山、呼兰集厂、朝阳山、吉昌、亮子河、栾家网、报马川、郑家桥、松咀十个分局。1912年至1931年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磐石的税捐基本是沿用清末税种、税目征税。1914年改厘捐为铺商销场税。后又制定颁发《吉林省税收章程》，除征收烟酒木税、山海土货税、印花税、粮食税外，因吉林负担奉系军阀连年战争的军费开支，还征收车船捐、赌捐、娱乐捐、妓捐、警捐等地方捐费，加重了全县人民的负担。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后，伪满洲国政府在磐石设立税捐局，局址现小南门外，租用官银钱号市房13间。后因火灾烧毁，迁至小十字街东南角，租用吉林商号景合公房屋17间做局办公室。税捐局下设烟筒山、黑石、呼兰、吉昌、朝阳山等五个税捐分局，又在栾家网、太平屯、郭家桥、亮子河、德胜沟、兴隆川、松咀、报马川等地设立九个分卡。磐石县税捐局隶属吉林税务监督署。全县按伪政府颁布的烟酒税、营业税、所得税等三十多种税法征收税捐、税款全部解缴伪中央金库。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为疯狂掠夺战争资源和财政收入，实行“战时增税”，开征新税种和提高各税税率。如家屋税；事业、勤劳、资本、法人不动产所得税；油脂税；砂糖税；清凉饮料税；特别卖钱税。此外有地捐、杂捐、书捐、戏捐、木捐，还有名目繁多的门户费、地费、家属费、婚书手续费、学田出产费、各税五厘杂款、各税罚金等，使广大劳动人民苦不堪言。

1945年8月15日东北光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

主联军解放磐石县。之后，国民党军队发动内战。为了取得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1946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进行战略转移，撤离磐石。6月国民党军队进驻磐石后，成立县税捐局，后改为永吉税务分局磐石稽征所。按国民政府和吉林省财政厅发布的税法、条例，向人民收的中央税有：营利事业、薪给报酬、证券存款利息、财产租赁等所得税，及印花税、遗产税、特种营业税、货物税、烟酒税、矿产税等七种。征收的地方税捐有：营业税、营业牌照税、盐税、地稅、屠宰税、牲畜税、使用牌照税、筵席税及娱乐税、房捐、木材捐、窑业捐、特产捐十二种。

1946年7月至1947年5月，国民党政府虽然发布税法，设立征收机构，但因处于战争时期，税收工作基本上没有全面展开。

附记：

### 我国税收之始

最早征收商税从周公时期开始。

最早征收田税在春秋时期。

最早对私人拥有的车船征税在汉代初期。

最早对酒单独征税在汉代昭帝始元6年。

最早从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化在明代戴宗正德年间（1506—1521年）。

最早免征人头税在清代康熙24年确立。

摘自《税史资料》

本文作者系经济师，县税务局离休干部。

## 儒界名流申尔庸

申国荣口述 张振国整理

申尔庸，1898年生于辽宁省盖平县。当时这个地方，人多地少租税重，穷人不容易维持生活，在他8岁那年，随祖父逃荒到人少地多的半山区一磐石县，落脚在明城镇的七间房屯，租种地主赵三爷的几垧薄地，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贫苦生活。

申尔庸从记事开始从事放猪、拾粪、扫院子的劳动，他劳动认真，从不贪玩，就是有个怪癖：活再忙也要抽空去赵三爷开设的私塾窗外偷听几句“子曰”、“诗云”的读书声。

一天，正当申尔庸趴在私塾窗前听得入神的时候，门吱嘎一声响了。他一回头看见那位白胡子老先生奔他而来，吓得他撒腿就往家跑。老先生叫住他，摸着他的头顶，躬身和气地问他：“你愿意读书吗？”申尔庸点着头回答：“愿意，可俺家穷，念不起。”老先生听了打个咳声进屋了。

隔一天的晚上，爷爷把申尔庸叫到跟前对他说：“从明天起，不用你放猪了，爷爷让你上学读书。遂即把桌上摆着的一叠白纸、一只“小楷羊毫”和一具砚台交给了他，并告诉他这是教私塾那位白胡子老先生给的。平素，因为爷爷的脸上总挂着愁云，申尔庸最怕爷爷，可今天，爷爷脸上现出了慈祥的微笑，申尔庸高兴地喊声“爷爷”就上前搂住了爷爷

的脖子。

申尔庸头脑聪敏，读书刻苦，不到半年就学完了一年的功课，并且成了这个班最听话，最懂事、成绩最好的学生。三年私塾，他读完了“四书”、“五经”。

家穷使申尔庸又回家务农了，天天放牧自家的几头大牛。

这种清贫的生活，使少年的申尔庸产生了“好男儿志在四方”的念头。他决心到外边闯闯，不蹲在穷山沟里受气，便说服了老人，单身一人赴船厂（吉林）半工半读念中学，三年毕业还不到20岁，便被烟筒山小学聘去当教师。不久，他又考取了北京大学，毕业后又返回这个学校，竟成了这个学校的名流了。

1930年，磐石县在南河套南边（今二二一医院处）成立了磐石中学，这是磐石的最高学府，校长要由大学毕业的学识最丰富的人来担任。几经挑选，申尔庸名列榜首，被推举为磐石中学的第一任校长。申尔庸认为“名师出高徒，良将带精兵”，只有博学多才的教师才能培养出博学多才的学生。于是，他聘请由北京大学毕业的董铭才当教务主任；聘磐石教育名流王德本当训育主任。教师中的张春元系北京大学毕业生，于徨池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于振民系磐石名师。

磐石中学设两个班，一是初中班有40名学生；二是师范班40名学生，全校师生不足百人。从此，磐石的高小毕业生不必到外地就读。小学教师也可以就地培养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占据了磐石。磐石中学的全校师生无不咬牙切齿，十分愤恨。

特别是从城市聘来大学毕业的张春元、于徨池等几位青年教师，对日本兵奸淫烧杀的罪行极为愤恨，他们无论在课堂上或是和学生闲谈中总是向学生宣扬“中国要独立，不当亡国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的爱国思想。学生们在张春元、于徨池进步教师的影响下，秘密组织了一个反日团体，其中主要人物是师范班的孟洁民、初向辰、刘克文、姜伯生、侯维春，王铁男等人。这些学生经常在课外拿着鱼杆以钓鱼为名到南河套集会，研究反日对策，策划如何贴反日标语。申尔庸知道后，也不过问，他见了这些学生总是微笑着向他们点头。在一次校长训话会上，他曾暗示性地讲：“磐石中学的学生是有造就的热血青年”。因此，反日的学生组织和进步教师对他也从不避讳。

一天，这些学生一边钓鱼一边研究反日对策，由于情绪高涨竟七言八语地嚷道：“……咱们订个时间上长白山找抗联，拿起枪跟着杨靖宇去打鬼子……”不料这事被一个警察知道了，便向警察署长告了密。那时，警察虽属日本鬼子的走狗，但是在日军咋到的时候，警察还象旧中国的巡警那样，敢欺侮老百姓，不敢惹学生，因为学生人多心齐敢斗巡警。巡警在学生身边过，学生就喊“巡警狗子，巡警狗子”巡警也不敢接茬。这次署长听了报告也犯难，向日本鬼子告密吧，怕日后遭到学生的报复；不告密，又怕鬼子知道后找警察算帐，最后决定去找校长，让校长压压这股风。以免把事情弄大，不好收拾。

申尔庸知道这件事后就帮学生辩解“哪有这事，一些小毛孩子懂得什么，说着玩呗……”。话是这样说，心里却认为学生这样做可太危险了。

为使学生不出事，为使中学安全，申尔庸便在一个阴雨

连绵的下午，把两个班的学生召集在一个教室开会，会上申尔庸暗示学生说“这些天外边风风雨雨很不安宁，学校就是咱们的家，可不要把风雨引进学校，风雨引进学校咱就没有家了……”这些反日学生听了，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便先后离开学校秘密地参加了李红光领导的反日队伍。学校突然少了10余名学生，申尔庸怕露马脚，便以这些学生旷课去钓鱼为由张榜开除了他们。

这些学生参加抗联队伍后，很快就成为抗联的骨干分子，1932年11月在杨靖宇的领导下，磐石反日武装改编为磐石游击队，孟洁民任总队长，初向辰任政治委员，其他人大部都是中层领导干部。磐石游击队在磐石山区开展了抗日游击战，给占领磐石的日伪反动军队以沉重打击。

1933年，申尔庸听到他的学生磐石游击队总队长孟洁民在1月1日于大旺乡长胳膊被反动地主张志仁杀害的不幸消息时，他一天默默无语，学生放学后，他伏几痛哭，一边哭一边叨念“何日能结束这坏人害好人的日子啊！”

1934年，申尔庸任县教育局科长。

1935年1月初的一天，天刚放亮，乌云漫漫，细雪纷纷，朔风凛凛，一伙从吉林来的日本宪兵，伙同几名警察和伪团丁忽地闯进了几所学校和几名教师之家，进行了大搜查、大逮捕，强行绑走了教育股长从树春、视学李渔舟、新接任的中学校长董铭才，中学训育主任王德本、永平小学（今镇一小学）校长于治洲等14名磐石教育界名流。日本宪兵用军用汽车把他们押往吉林。申尔庸对此种暴行十分愤恨，他当天就走访了三所小学，对这些学校的教师说：“日本人随便抓人，蛮不讲理，你们要多加小心，躲一躲。”并决定镇内学



校停课3天。

同年，申尔庸的老乡、抗日游击队员李万和被日本宪兵抓去押进吉林监狱。申尔庸知道后直奔吉林，通过教育厅的老同学买通了省监狱的一名刑事科长，用假良民证保释出狱，使李万和又回归抗日队伍。于此同时，他还受游击队交通员崔大山、毛才之托为游击队买马牌手枪一支，油印机1台，步枪子弹200发，支持抗日斗争。

1936年，磐石县勤劳奉仕队要去国境线修筑军事工事。勤劳奉仕队员是不合格的国兵，俗称国兵漏，也属于劳工。出县参加劳动、活累、吃不饱、穿不暖、劳动环境苦、去的人几乎是生去死归。伪县公署为收买人心特地为这些人开了个“欢送会”，会上，伪县长指名要申尔庸代表教育界登台讲话。望着勤劳奉仕队员的愁眉苦脸，听着挤在勤劳奉仕队四周家属的哭泣声，申尔庸的心碎了。他登台说了两三句话就不住擦眼泪。这件事引起了副县长三玉不二男（日人）的怀疑，于是在他的档案里签上了“可疑”二字，于当年冬把他调到入烟稀少的边远沙漠地区——乾安县当教育科科长。不久又把他调到北满靠近黑龙江的小县城当教育科科长。

申尔庸家庭人口多，只靠薪俸收入，生活十分贫寒，因此，大女儿、二女儿高小毕业就辍学了。三女儿申国荣头脑聪敏、学习勤奋，在天一小学毕业后，由于挚友于芳圃的劝告，申尔庸才让她考入吉林女子高等学校。可他对穷学生却十分宽厚。磐石中学师范班有个叫林月庚的穷学生，家中无劳力，生活贫困，入学不久就要退学。申尔庸知道后，对林月庚说：“你学品兼优，没钱不要紧，我供你。他慷慨解囊，供吃、供穿、供学用品，使林月庚顺利地完成了中学学

业，以后当了一名出色的小学教师。

土改时，土改工作队发现他家藏有大量的古书，就要烧毁，申尔庸的学生——参加过抗日游击队，当时是土改工作队负责人的姜伯生听说后，急忙给工作队来信说：“我的老师在抗战时支持抗日战争，为人光明磊落，他的古书一定要归他所有，不能焚毁……”，此后申尔庸被尊为开明人士。1985年1月申尔庸病逝于北京，享年87岁。

申国荣系申尔庸后人；整理人系磐石四中离休老教师。

## 境外兴学的磐石名儒于振民杨士楨

**于耀洲**口述 邓晓溪整理

清末，我省的一些有识之士为了振兴中华，曾不遗余力地在兴办现代教育上做出贡献。其中，由长春富商王荆山出资兴办的自强学校，就是其中的一例。这所学校，曾为国家培养了许多有用人材，在省内享有盛名。

而创办这所学校的，却是磐石的儒界名人于振民。

于振民，原名于振纲，号云翻(通常写作云阁)，一八八四年生于磐石县二区烟筒泡子屯。他早年立志从教，视启迪人民的事业为天职。清末，他于吉林省立第一师范简易科毕业后，于一九一三年三月，出任磐石县高等小学校长。据一九一五年七月的资料记载，磐石县的十一所小学校里，只有磐石高等小学校的于振民和磐石天一女校的张成熙是官方委任的校长。可见，那时于振民就成了磐石教育界的名流。一九一九年二月，于振民由磐石县视学升任县劝学所长。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他遵照“好男儿志在四方”的格言，毅然辞去磐石县劝学所所长的职务，只身一人前往长春求晋。时值长春富商王荆山兴办义学，渴于求贤之际。于振民经旧日同学引荐，与王荆山一见如故，王氏当即将办学计划，全部交于振民一人承办。

于振民本着为振兴中华培养自强人才的办学宗旨，悉心

经营这所学校近四年，使这所私立学校成为省内颇负盛名的新学。

一九二六年，适逢吉林省女子第二高等小学力图整顿，迭经数人联名推荐，力邀于振民出任这所学校校长。正在于振民欲离不忍，欲就不得之际，他的得意门生杨世祯留日毕业回国。于是，于振民便推荐杨世祯接自强学校校长之缺，而自己则赴任吉林省女子第二高等小学校长。但不过数月，又值磐石县视学一职悬缺。时由磐石县教育局局长丛德欣的力荐，于振民又不得不复返磐石就职。

此后，长春自强学校的经营管理工作，则由杨士祯一人主持。杨果不负于振民的荐举和王荆山的委托，办学执着认真，工作十分出色，而被时人称颂为“杨磐石”

被时人誉为杨磐石的杨世祯，系磐石县人。杨世祯，字维周，出身贫寒。杨在磐石县高等小学读书时，就因家庭生活困难而几欲辍学。但杨在校读书十分刻苦，成绩优异，两年之内，竟把自己的狗皮坐垫上的毛磨得精光，因而深得校长于振民的器重。于是，于振民不仅出钱资助杨升学读书，而且，招杨为婿。后来，杨在于家的资助下，读完吉林省立师范，而后再去日本留学。

于振民笃信：“学以为人师是神圣的职业，一尘不染，一身清白……”而杨世祯则是恪守这一信条的众弟子之一。

杨后来在长春自强学校夙兴夜寐，奋斗终生，为培养人材，特别是培养贫民出身的子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此项，已为长春市的老一代的居民所共知。因此，杨深受学生和家长的敬重和爱戴。又因杨是磐石人，而被当时的长春居民送个雅号叫“杨磐石”。

于振民后来虽一直在磐工作，但他对杨世祯一直是十分关心。在杨的妻子去世后，又经于振民亲自出面介绍，让杨与王荆山的妻妹结成了良缘。

长春私立自强学校的学董是长春富商裕昌源面粉公司总经理王荆山，所以，初办时，人们都惯于称呼这所学校为“王氏学堂”。

王氏幼年家贫，无钱读书。民国初年，与其弟到长春火车站拣煤渣，以卖煤渣度日，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叫花子的生活。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被当时在长春兴办面粉工厂的一位俄国客商所撞见。俄商认为：王氏兄弟是一对廉价的劳动力，家中又无其他牵挂，雇用起来十分放心，便将其二人招为面粉厂的仆役。从此，王氏开始过上一种仅能维持温饱生活的日子

那时，王氏虽然很年轻，但因其为人忠诚老实，勤奋刻苦，而颇得俄商的信任。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沙俄军队败北。该俄商见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我国东北迅速扩大，自己难于继续在长春立足，便将面粉厂主权交给了王氏，自己逃回俄国。此后，这座面粉厂便由王氏个人经营。

王氏幼年家贫，未入学门，识字甚少。他曾发誓：在发家之后，第一件要办的大事就是要靠自费兴办一所义学，让那些无钱读书的穷家子弟，都能按时入学读书。

由于王氏的苦心经营，长春裕昌源面粉公司生产的三羊牌面粉，很快就以名牌的北方面粉畅销全国，王氏也成为长春市屈指可数的富商之一。于是，按照他立下的誓言，于一九二二年前后，着手筹办私立王氏学堂。为此，王氏四处招

贤，找到了于振民，并托以办学重任。

王氏在办学上，也如同他办面粉厂一样，苦心经营，舍得投资，并将其子女也送入该校学习。

为了记述王氏的发家史和创办义学的功德，于振民在任期间，曾为王氏撰写过家史和个人传记。其家史和传记，均由王氏自述，于振民执笔，后经石版印刷。

注：于耀洲，系于振民之侄，杨世祯妻弟，磐石县教育界前辈，曾任小学、中学教员、校长等职，曾被推选为磐石县政府委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1994年病逝于磐石、享年90岁。

本文作者系县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磐石县委员会秘书长。

# 入朝三百六十日

——磐石县抗美援朝民工担架队参战回忆录

韩枫 姜涛回忆 高庆山整理

## (一)

抗美援朝期间，1950年的10月，磐石县人民政府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的指示，从城关区（即磐石镇）、太平区（今宝山乡）、细林区、朝阳山区、明城区、东来区（今石咀镇）、富太区等七个区动员抽调民工二千余人组成了“磐石县人民志愿抗美援朝民工担架第一支队”。支队为团建制，下属五个大队（为营建制），大队下设中队（为连建制），中队下有小队（为排建制）。支队、大队干部全系从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抽调的脱产干部担任。中、小队干部基本上是城镇的街长和农村干部担任。

考虑到担架支队到朝鲜联系工作的方便，特从朝鲜族中学学生中抽调辛钟寅、尹桂旭、全崇铁、吴龙洛、黄在兴等5名学生担任翻译工作。同时还为支队配备了五名公安战士做保卫工作，两位医务人员做保健工作。

10月中旬，抽调干部和集中民工，进行编队，准备担架及各种赴朝应用物资等。当时担架支队各级干部（支队及大队）人员配备及名单如下：支队长：蒋承智；政治委员：韩

枫；副支队长：冷青云、董士华。另有翻译5人、保卫人员5人，医务人员2人。

大队干部：

第一大队：

大队长兼教导员：沙继鸣；副大队长：于希文。

第二大队：

大队长兼教导员：许有功；副大队长：赵德鸿。

第三大队：

大队长兼教导员：鲁德；副大队长：高洪凤。

第四大队：

大队长：赵连君；教导员：翟玉民；副大队长：唐坤山。

第五大队：

大队长：柴有良；教导员：李景春。

（在担架支队入朝两个月后，县委、县政府为加强担架支队的干部力量，又增派张青山、郝士兴、姜涛、林树东、赵化等5同志赴朝参加支队的工作）。

1950年10月19日，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全体员工在朝鲜族小学院内（今县宾馆）集合准备出发。临出发前，磐石县副县长乔仰峰向大家做了动员讲话和嘱托。当晚11.45磐石县全体民工在省民政厅战勤科的同志带领下，由磐石乘29节车厢组成的专列出发，翌日（20日）午后3.00到达辑安（今集安市）

## （二）

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一分部派运输处常处长在辑安站接收了担架一支队。常处长在辑安车站向支队干部作了简单地



部署。他说：“你们是我国第一支志愿入朝的民工担架队，入朝后，你们一定要做出榜样来。现在支队的全体干部员工都不要下车，继续出发入朝，到中城干后转前川郡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找王部长联络请示工作。”他还嘱咐大家说：

“朝鲜是我国的邻邦，到朝鲜一定要尊重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不准擅自进入老百姓家；随时随地注意防空。到朝鲜主要是夜间执行任务，不准点灯、不准吸烟、以免暴露目标遭到空袭”。当日（1950年10月20日）午后4.30列车继续出发，过了鸭绿江经满蒲市、江界市后到了中城干。在这里留下一个中队执行任务。列车继续前进，21日凌晨，支队到达前川郡。

当日上午按照指示，支队干部到志愿军后勤一分部第一兵站报到。兵站政委朱郁、副站长孙孝臣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朱政委不仅向我们交待了任务，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注意事项。他提出：要做好民工的政治思想工作，坚定其克服困难为战争服务的决心；要尊重当地民众的风俗习惯，加强中朝人民的团结和友爱；要注意防空、以保障民工的人身安全；特别要注意保密工作，不要讲的问题，决不能讲……。

10月21日晚（即到达的当日晚），全体队员立即开始执行任务。当时主要是装卸物资，是把由国内用火车运来的物资卸下来，把运往前线的装上汽车。前川郡是座县城，已被敌机轰炸得到处残垣断壁，成了一片废墟。民工支队在这里夜间工作、白天就找隐蔽的地方休息，直到11月6日全部完成任务。11月7日又奉命开赴熙川。

民工支队在行军途中为了避免敌机的空袭，昼伏夜出强行军三日到达熙川。熙川这地方志愿军存放的物资较多，这

里的人也较复杂，特务活动得很厉害。白天经常有人打信号弹指挥敌机轰炸，夜间打黑枪暗杀我方人员的事时有发生。尽管条件恶劣，困难重重，民工支队的全体人员以大无畏的精神，仅用了20天的时间就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在这20天中，由于运输的困难，后勤供应难以及时，队员们有五六天没有粮吃，白天就冒险到地里拣点玉米用水煮了充饥，有时遇到敌机袭击，就在野地里原地卧倒隐避。民工们没有牙膏刷牙就用盐面代替。在熙川执行任务20天，支队全体人员没一天脱下衣服休息过。有的队员在防空袭隐避时风趣地说：“抗美援朝不死的人，都能活到一百岁。”

11月29日完成了熙川的任务，30日奉命出发，仍是夜行军直奔球场附近的兰田煤矿。在行军途中，路经新兴洞，这是一个铁路隧道。全体队员在洞内防空待避，后来被敌机发现了轮番对小洞两头进行轰炸、扫射、投掷汽油筒、燃烧弹，达一天之久，情况十分危急，直到天黑才解除了空袭。

民工支队继续行军，至第五夜方达到兰田煤矿。这里归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兵站一分站领导。分站郭奎全站长部署任务后，民工支队立即投入工作。在这里除装卸任务外，还要负责往后方转运伤病员。时隔不久，民工支队又被划归第五陆军医院三所领导。也就在这时，磐石民工支队接到了中共磐石县委书记兼县长罗鸿忠给支队干部的一封慰问信，使支队全体人员都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在兰田仍是夜间执行任务、白天休息。这一段时间的主要任务是转运伤病员。虽然是在夜间，敌机依然是几分钟就来空袭一次。民工队员们都发挥了高度的责任感，宁肯自己冒生命危险，也要保护好伤病员的安全。队员们说：“伤员是

人民的功臣，我们就是豁出一切也要把他们安全地转运回祖国去休养”。赵恩普一次冒着浓烟烈火从被敌机打起火的民房里连续救出了两名伤员。

这一时期转运伤员的任务较重，有时一夜就转运数百名伤病员。尽管是转运任务重、敌机不断地空袭，危险较大，但队员们对伤病员却倍加爱护，行动迅速，人人都做到了对伤病员轻抬轻放，尽可能的减轻伤员的痛苦，并保证了按上级要求时间完成任务。如12月29日晚，共转运伤员300余人，同时还给医院运送大米百余包、罐头50多箱，掩埋了几十名烈士的遗体。因而受到志愿军领导的表扬，并给成绩突出的个人各记小功一次。

磐石志愿民工担架支队的全体人员一直牢记县领导的嘱托、志愿军首长的告诫。时刻做到密切联系群众。每到一处都要给群众做好事，挑水、扫院子，把一切方便让给群众，所以到处受到群众的称赞。群众都说民工支队是志愿军的好运输部队（入朝后民工都穿志愿军的军装）。支队为了把任务完成得更好，根据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一分部政治部的部署，从12月份开始，在全队范围内开展了挑战竞赛的立功运动。

1951年的元旦后，磐石民工支队奉调赴球场（地名）执行任务。至1月中旬又转调顺川，2月下旬又奉命开往三登执行任务。

三登是敌机空袭的重点目标之一。因此，民工支队到三登后，除完成正常转运、装卸任务外，为了伤员的安全还修筑了许多防空洞给伤员防空待避用。在三登执行任务期间，也有的大队被调出单独执行任务。

民工担架支队到朝鲜后，由于战争的需要，执行任务所属领导部门变动次数较多，有时人员也比较分散。直到1951年下半年（即五次战役之后）才逐渐地稳定下来，把各大队稳定在一个地方执行任务，直到回国。支队的干部也都分兵把口，随各大队或中队到执行任务地点亲自领导和指挥。在这一个时期，担架队分别在如下单位执行战勤任务。

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一分部医管处第五兵站医院：支队干部有蒋成智、大队干部林树东，供给员孙野；

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一分部医管处第六兵站医院：支队干部有韩枫、大队干部赵廷君，翻译辛钟寅，通讯员汪树林；

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一分部第二兵站：支队干部郝士兴，大队干部赵化；

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第一分部军械处第一仓库：支队干部张青山，大队干部姜涛；

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第一分部第四兵站第五仓库：负责人是大队干部沙继鸣。

支队民工不管分配在哪个单位，其主要任务都是转运伤员、装卸物资，并一律是夜间执行任务。民工支队各大队虽然确定了归属指挥执行任务单位，基本稳定下来。但战事却越来越激烈，加之恶劣的自然条件，使支队民工更加困难重重。8月的朝鲜正是阴雨连绵的季节，到处河水猛涨，不仅冲毁了当地居民的住宅，部队的物资也被洪水冲走了许多。民工队员们除正常执行任务外，还要抢救物资，帮助群众抗灾，不分白天黑夜地拼命干。一天刘福有带领一队人在三登执行任务，突然被洪水包围。刘福有沉着地指挥队员突击抢

救物资后，暴涨的洪水已封住了他们的退路，水势仍在上涨，全体人员被浸泡在齐肩深的水里，在这危急时刻，刘福有指挥队员分散攀上几棵大树的顶端，在树上呆了一天一夜，直到洪水退去，才回到驻地。

### (三)

磐石县人民志愿抗美援朝担架支队入朝后组成了担架支队的党委会。党委成员有韩枫、蒋成智、郝士兴、姜涛、沙继鸣、林树东。韩枫任书记。党委会在任务繁重、工作紧张的一年中，在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同时，还坚持组织发展工作，不断地为党组织增加新鲜血液。根据本人申请，组织考核，经支队党委批准共发展赵廷君、马德山、满连有、李喜春等4同志为中共侯补党员；孙野、汪树林、高云峰、赖长友等4同志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的前身）侯补团员。

在朝的一年当中，支队党委还拟定了条件、开展了三次立功竞赛运动。立功竞赛的具体条件是：①工作积极主动，能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出勤率高；②主动爱护伤员，爱护物资；③团结好；④遵守群众纪律，尊重当地群众的风俗习惯；⑤服从领导，执行任务不讲价钱；⑥以身作则，主动帮助别人，不讲怪话积极宣传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在这几次立功竞赛中，共有一百四十余人次受奖。其中立大功的11人，立二小功的30余人，立一小功的90余人。

立大功的人员有杨福有、满连有、蔡万福、赵恩普、杨明俭、马德山、李喜春、崔振峰等人。荣获勋章、军功章和抗美援朝纪念章的支队、大队干部共8人。其中韩枫、蒋成

智、郝士兴、林树东、姜涛、沙继鸣等6人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赵廷君、孙野二人各荣获军功章一枚。以上8人还各获抗美援朝纪念章一枚。

支队全体人员在朝鲜执行任务的一年间曾受到过中央慰问团，松江省慰问团、吉林省慰问团的慰问。祖国亲人给他们带去了物资、锦旗、奖章及慰问信等。特别珍贵的是祖国人民的一片深情厚意。

#### (四)

磐石县志愿抗美援朝民工担架支队，在朝鲜执行任务整整一年。于1951年10月，民工支队奉命在三登集中准备回国。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奖给支队一面锦旗。上绣“把光荣带回祖国去”八个金字。朝鲜的地方政府和群众赠给支队多面锦旗。

10月中旬，民工支队（除入朝后随部队走的、因伤病提前离队回国和牺牲的人员外）在三登集结后，乘火车回国。途径顺川，新安洲等地，20日即回到祖国的安东（今丹东）。在安东休息了几天，全体人员都换上了新棉军装，乘专车于24日到达磐石。

1951年10月24日的磐石县城内，彩旗飞舞、锣鼓喧天，人声鼎沸。机关干部，中小学学生、工商各界，居民群众万余人，敲锣打鼓排列在由火车站到县政府的大路两旁，夹道欢迎凯旋而归的支队全体人员。到火车站欢迎凯旋战士的有中共磐石县委书记兼县长罗鸿忠、副县长乔仰峰及县委各部部长等领导同志及部分县直机关干部。支队全体被夹道欢迎至县政府院内后，举行了临时欢迎大会，然后分别到已准备

好的招待所、旅店休息。

10月26日，磐石县各界代表在县人民政府礼堂举行了隆重的欢迎民工凯旋归来大会。

10月27日上午，县委、县政府在县礼堂为在朝鲜执行任务而牺牲的人员召开了追悼大会。

10月31日，磐石县人民政府为凯旋归来的支队全体人员召开了庆功大会。在大会上表彰奖励了有功人员。对立大功者颁发了省人民政府制发的奖章，对立小功的人员也给予了奖励。对全体民工每人除颁发一枚抗美援朝纪念章外，并发给每人一份抗美援朝服勤证。

1951年11月2日开始，民工支队的全体干部和民工分别回到自己的生产、工作岗位。

韩枫，当年赴朝担架队政治委员；

姜涛，当年赴朝担架队负责人之一；

高庆山，县离休教师。

## 一宗投毒谋叛事件的追忆

宋景文

一九四九年春，我正在当时取柴河区政府任财粮助理工作。政权初建、百废待兴，全区干部集中全力开展建政和春耕备耕工作。一般是下乡十天，回区汇报整顿五天，再下乡十天，依此循环，工作是苦一点，但大家热情极高，都是夜以继日地干。

这年的三月二十九日，正是区干部下乡回区汇报的日子，区政府的全体干部都集中到一块，区委、区长召集大家汇报工作。下午四点多钟，开饭时间到了，大家有说有笑地到食堂吃晚饭，那天算改善生活，狍子肉炖萝卜，肉炒白菜片。在农村熬苦了十来天的我们，分外感到菜饭那么可口，不一会儿，就“酒”足饭饱地陆续回宿舍休息了，因为晚上还要继续开会。就在这时，一场出人意料的事件发生了。最先是三个同志，惨叫一声倒在地上或炕上，接着又有六、七个同志相继倒下，大都是口吐血沫，两手紧握，全身抽搐，肚子疼、心闷、头晕。接着，所有同志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这种症状，真是祸从天降啊。

当时，神志较清的区委沙继明，区长苏振阁似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一边派人到三新屯（车站附近）把张守明大夫请来急救，一边命令民兵立即看管好武器，并集中严密看守好



当时羈压在区里的十二名有问题的待查人员，一边指定专人立即向县里报告，并请求派医生前来抢救“发病人员”，派公安人员前来进行侦察工作。县、省领导对这一事件非常重视。县组织部长窦增鲁率公安人员和医务人员，省派遣医务人员连夜乘火车赶到取柴河，立即开展了抢救和侦查工作。经过一段紧张工作，急性传染病这种可能性排除了。通过发病人呕吐物的化验、证明食物中含有烈性有毒物氰化物。至此，事件的性质大致清楚了，这不是传染病，也不是一般食物中毒，而是一桩有人在食物中投毒造成的全区干部二十六人中毒，其中四人严重中毒，危及生命的恶性事件。但是谁是投毒者？投毒的目的是什么？这些在当时，我们还无从知道。

经过省县公安人员的周密侦查，突击审讯、政策攻心等一系列艰苦工作，这桩震惊全省的投毒谋叛大案终于真相大白了。

这个投毒谋叛的主谋，是王金山。此人住取柴河区、桦皮河子村黄岗屯，当年三十九岁。早在他二十一岁时（1931年），就曾在辉南、磐石一带为匪，投靠“滚地雷”脚下、报号“五龙”，为害一方，作恶多端。后来查清，还杀害两条人命。就是这么个坏人，乘解放初新政权初建之机，混入黄岗屯农会、当上小组长。后于四九年春“建政”时，群众检举他当过土匪，为弄清问题，区政府把他羈压在区上，令其交待问题，争取宽大。但这个顽固不化分子、非但不认真交待罪行，反而怀恨在心，经过长时间的谋划，选择了这条投毒谋叛重新为匪的罪恶道路。

为了实现罪恶计划，他暗中寻找同谋，最后，终于选中了惯盗、与他一同羈压在区上的杨玉清。三月二十二日，轮

到他和杨玉清在菜窖干活。王金山诡密地对杨说“你的罪很重啊！我也不轻！都得判几年徒刑。我有很多好朋友、过去都当过胡子。你弄点野鸡药、我也弄点，等区干部下乡回来改善生活时下到菜锅里、把区干部药死，药不死的都枪毙他。然后抢供销社、林务所，火车站，最后去夹皮沟当胡子”。两个恶人，一拍即合，经过一番策划，一个阴谋逐渐成型了。

接着，王金山又开始准备野鸡药。他用巧言骗使他的干妹夫许芬于三月二十六日，用马爬犁拉着他老婆一起到区上面见并带给他野鸡药一两半，以备作案。与此同时、他的同谋杨玉清也通过不明真相的农民赵光林乘到街上卖柴之便，以东北币一万元买回野鸡药一块并一并交给了王金山。

计划有了，药也备齐了，怎样把药投进去？怎样才能万无一失？王金山确实费尽了心机。他为了检验药效，先把少量的药放在苏区长的饭碗里，苏区长吃后，感到肚子疼、头痛、吐血沫，但误认为是在部队里腹部受伤落下的老毛病犯了，后来吃点药也就好了。经过这次试验，王金山感到药是有把握了，但怎样下毒呢？他看准了区上临时代替炊事员甄宝泰。他以巧言骗甄让他帮厨，以便借机下药。

二十九日这天，王金山以改善生活忙不过来为由被叫来厨房帮厨，菜炖好后王乘机把药全部投到锅里，这就是这桩投毒谋叛事件的真相。

坏人干坏事，总是逃不出一个规律，那就是以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这个案件的主犯王金山，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七月十九日，被最后判决死刑，七月下旬，在取柴河屯南门外小东山，随着一声枪响，结束了他罪恶的

一生。另一主犯杨玉清，罪恶极重，但念其事后具实坦白，尚可改造，判十二年徒刑。但后来该人不认真改造，服刑期间越狱并继续偷盗、杀害人命一条，后于一九五一年春被处决。其他涉及此案人员也做了处理。

这件事已过去四十五个年头了，但现在回忆起来，仍然感到余悸未消，大有终生不忘之感。

本文作者系原县卫生局副局长；当年事件受害人之一。

封面题字：庄德成  
封面设计：冉景贤  
责任编辑：亓淑兰

磐石文史资料

第七辑

---

磐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吉林省内部资料准印证9403031号

---

磐石县印刷厂印刷